

第二章 该杀当死

被服线与纸条儿

火车走得很慢，下午四点才到长春。天已冷了，行人很少。有一些穿美国军服的人在街上若无其事地走着，可能是 60 军的起义人员。“四五六”饭馆开张了，但是还有不少的商号没有恢复营业，显得有些萧条。我看到有些建筑挂着红旗，今天是 11 月 12 日，孙中山的诞辰。也许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吧？

卡车把我们拉进长春警察局。只有 20 多天哪，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心里十分难过。

我们被领到一座又破又小的红楼里。这个小楼靠大街，没有围墙，街上的行人看得很清楚。楼上的窗户都没有了，几个木匠正在修理。

天快黑了，一个战士提了一桶苞米粥，一桶白菜炖土豆。他把我们领到一个铺地板的屋子。那屋的窗户玻璃破了几块，地板上铺了一个破席子，墙上还有日本式的壁橱。我吃了一碗饭、半碗菜，便放下不吃了。到九点钟，我们大家就躺在地板上入睡了。我睡在墙

壁上的橱柜里。大家谁也不愿意说话，内心都在考虑自己的问题。到这儿怎么办？第二天我被领到一个小弄堂里的空屋子，屋内有一个讲坛，二尺来高，木头做的，可以当床也可以当凳子。一个徒手的战士在这个小弄堂里来回走着。我往对门的小屋子一看，原来是尚传道，长春市长。他穿了一件蓝色棉袍，拿着一厚本书在那看着。他见到我马上打招呼。我对战士说：“纸烟没有了，请给我买几盒烟。”尚传道闻声便给我送过一盒纸烟，一盒火柴。我问尚传道还有谁来了，他说：“王焕斌（吉林省教育厅厅长）在我隔壁，岳希文（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在你的隔壁，我斜对门的那位是警察局的，不认识。”

我把门打开，假作吐痰的样子，往门外一走，往左一看，看见了警察局的那个人，是左炎，警察局督察处调查股股长，我的学生。我回到屋子仔细一想，这个弄堂里的几个人，是长春各机关的典型，尚传道是政府领导，岳希文是国民党干部，王焕斌是三青团吉林负责人之一，我是军统特务的主要分子，都是反动派的主要人物，很危险。把我与那七个人隔开，说明我比他们更重要。

晚上我这屋没有灯，只从门玻璃射进一些走廊的电灯光。我在屋内往来地踱着。七点钟来了一个战士，把我的行李、毯子一齐抱走，什么也没有讲。这是干什么？过了20分钟又给我送回来，并叫我跟他走。走进一个屋子进行登记，姓名、年龄、籍贯等。这时过来一个红脸膛的人，有三四十岁，满脸皱纹。他叫我脱衣服检查，并把我皮鞋上的带子，扎裤子的皮带都留下了。我明白了，这是看守所。昨天想到长春住什么招待所都成泡影，现在我是一个犯人了。

我住的这个屋子是洋灰地，地下有个大窟窿。我往下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团被服线，我拿出来一条，有一丈多长，有用，保留起来，我把被服线偷偷放在饭包里了。

过了不久，尚传道、岳希文、王焕斌和我搬到了小红楼。我被指定住一个小屋子，屋里放着一个木架子，上边有个草垫子，日本人叫“他她蜜”，是我的床。我往四周一看，墙上有个小洞，我赶紧把藏在裤兜的被服线取出来，塞进了这个小洞。

起床、睡觉没人管，第二天早上到吃饭的时候才起来。不洗脸，也不洗手，下床就盛饭，是很稀的高粱米粥，汤多米少，一碗豆腐渣吃不饱。我看王焕斌他们也吃这样的饭。他们吃饭时都要求盛饭的战士：“给我一点干的。”战士回答：“都一样，没有干的。”

一天午后，我正躺在床上睡觉，突然进来一个挎手枪的战士，他叫我起床。我随他出了小红楼，过了办公大楼，进了局长室。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40岁的干部，脸有些苍白，他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这个人很沉稳，看了看我，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的。”

“从吉林到这多少天了？”

“12日到的，有半个月了。”

这位是什么人？我要明白一下，不然说话不方便。与中级干部谈话是一种方式，与高级干部谈话又是一种方式。

“我可以知道您的职务吗？”

“我是公安局的秘书长，今天我代表局方与你谈话。”

“那好极了，我一定好好回答。”

“咱们这不是审讯，随便谈谈。”

没有题目，他问了许多特务内幕，又把宽大政策给我讲了一下，说着随手从抽屉里拿出来一本旧的文件，他打开之后，对我说：“这是我们学习的文件，你看……”

我走过去，他用手指着画了红道的词句对我说：“这就是对待反革命分子宽大政策的具体实施……”我按着他的手指一行一行的往下看去，后面还有对叛徒的宽大，凡是有悔改表现，均不处死。无论什么犯人，一律不准用刑讯、逼供、拷打等。

“我们的这些政策从上而下，任何人都要遵守的，不准任何人违犯。因此你要相信宽大政策，好好坦白。坦白从宽，否则就不好办了。”谈到在吉林的情形，他说：“我看到你填的表，‘以特反特’，这是你的看法，我们人民就可以反特，不用‘以特反特’。不过你有这种心情还是好的。听说你在吉林协助政府‘找’了不少人，这种表

现在长春还要发扬。”

接着他又问戴笠的一些情况，我说了许多，最后我说：“将来有时间，我把戴笠的事写一本小册子。”

他告诉勤务员把我送到李副科长处，我随之出来了。我问勤务员这个秘书长姓什么？他告诉我：“姓龚。”

回到小红楼监房，感到同龚秘书长谈话很痛快，对宽大政策有了一点底儿。人在失意或在倒霉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句同情的话，关照的话，都是雪里送炭。当一个人成了犯人，有人对他和蔼一些，客气一些，他都受之有愧，感到特别的温暖而备受感动。

我要求看守所给我买纸烟、花生米、咸菜，下午都买来了。是那位张看守长亲自送来的。这位看守老是板着面孔，从没有一点笑容。他对犯人毫不客气，犯人都怕他。他把东西往屋里一放，一句话不说就走，什么“辛苦了，谢谢。”这套话他听都不听。以后我也不说这些客套话了。

与看守的战士在夜里聊天。他们知道我们这几个住单人号的是职位比较高的，因此他们对我们比较客气。我问他每天吃什么？

“也是高粱米粥。长春一解放，老百姓都没有吃的，为了救济难民，粮食不够吃。我们也吃稀的，与你们一样。”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呀！不仅仅是犯人喝稀米汤，军队也是如此！这可与国民党的军队不同，八路军这样做可以说是与人民共甘苦。既然如此，我喝米汤也是应该的。

一天上午，我发现窗前有一个纸条子被风吹得飘荡起来，这个纸条子上有“小心……”字样，我一想，大概是我案情重要，因此在我这屋的窗子前面贴着“小心看守”，以提醒看守对我注意，以免逃跑或发生意外。我趁着看守不在，问隔壁的左炎：“你窗前有纸条没有？”

“没有，屋里看不见，窗户前而不准去。”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想了半天，安慰道：“告诉看守注意你，并非是坏事，你不要过份的瞎想。”接着他又告诉我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

佩也来了，“你见到没有？也在这个楼上住。你知道不知道，他的小老婆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在解放前五天，袁家佩亲自送她出卡哨，说是去沈阳。到了卡哨，卡哨长韩伯敏不准他的汽车出去，听说后来给你打了电话，你叫韩伯敏放他的汽车出去。周小姐一出卡哨就回到了解放区。五天以后长春解放，袁家佩在公馆里坐着，打电话给八路军，自报家门，要八路军抓他。于是这里派人把他接来了。袁家佩到这儿已经日子不少了。”

我问：“袁家佩知道不知道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

“是后来知道的，因为他的许多重要文件都被她拿走了。”

“周小姐工作搞得好好哇，我与袁家佩住得很近，每次开舞会，袁家佩都是一个人来，他的太太从不露面。我当时有所怀疑，问袁家佩，他说内人身体不好。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位周小姐是什么模样。”

左炎告诉我警察局一分局局长李海涛、二分局局长张宝田、三分局局长马衡、四分局局长杨双贵等人都来了。马衡现在公安局的感化所，那里比这自由，人比这里多。

我们楼下还有许多监号，押的人比楼上的多。楼下的犯人在院子里放便，楼上的岗也随即撤到楼下。我站在床上，一个一个地数，有60多人。有中统长春区秘书刘芸峰、军统长春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警察局外事科长孟益龄等。有一次我到前面办公大楼谈话，遇到他们晚饭后放便。只要有一个看见我，就都知道我来了。不管看守所的纪律有多严，犯人照样串供。

前面还有一个圆楼监房，这个监房是日伪时期建筑的。有楼上楼下，各屋没有窗户门，一律是铁栏杆。一个看守站在圆楼中间的台子上，楼上楼下的犯人一览无余。现在楼上押的是反革命犯，楼下押的是刑事犯。刑事犯不多。

少一个负担，多一个顾虑

人民政府发表一批战犯的名单，从蒋介石开始共 43 名。接着北平解放。我的家不知怎么样？大老婆、二老婆、父母及孩子是不是因为我要受很多牵连？我的心很挂念，自己又不能要求写信，只好默默地祝祷父母二位老人身体健康，在梦中相见吧。

在小便所里遇见袁家佩，他的腿有风湿病，我问他有什么消息没有？他说：“咱们都是小战犯哪，不好办呀！”

我摇摇头，不同意他这种说法。

他说：“你不信，将来看吧。”

我看袁家佩很悲观，身体又弱，最近能释放还没有问题，日子多了，危险。

没有几天，岳希文迁到楼下与一般反革命住在一起了。不是优待吗？怎么又不优待了？王焕斌因为家中有支手枪没有交待，他老婆交待出来了，认为他不老实，也不优待了，把他押在我右侧的普通号。他那屋有督察处的后任情报科科员郑鑫，我与他们只隔一间便所，这便所只有我去小便，别人不去。岳希文下楼，袁家佩顶了他的缺。我们这一侧的次序是：袁家佩、左炎、我，小便间，王焕斌，最后一个屋子也是普通号，押的是王心一，他是军统外围分子，长春香烟厂厂长，还有其他几个人。

12月1日早晨开饭的时候，我照例把门推开，把饭碗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一个战士提了桶稀饭走过来，他对我说：“今天不给你吃这个饭了，回头有人给你送饭。”

不大一会儿，另一个战士挑了一桶饭和一桶菜，放在我的门口，他把对面的门也打开了。这个战士送来的是炖豆腐，高粱米小豆干饭，闻着很香。他给我盛了一碗干饭、一碗菜。这时门前的看

守对我说：“你们这几个人的饭与干部一样。那些普通号仍然吃稀的。”

我吃得很香，感到一样的反革命，王焕斌、岳希文、印匡时等人吃稀饭，我们这十来个人吃干部饭，问心有愧。我回忆起1948年7月，长春饿死数万人的时候，长春督察处押了一百多犯人，内中有几十个“政治犯”。这些犯人春天吃高粱米干饭，后来改吃稀饭，7月长春粮食奇缺，囚粮困难，又改喝米汤，最后吃霉烂的糍子。当时我对管理犯人伙食的特务说：“只要这些人饿不死，吃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他们有一口气，咱们就能交差。”

那时，“政治犯”在特务看守所吃不饱，睡不好，受尽了折磨。后来这些人都被我们杀害了。现在我受到共产党如此的照顾，越发显得自己从前的卑鄙和残忍。

我在屋里反复思索，我应该干些什么呢？政府这几天对我照顾得很周到，自己不能无动于衷，装聋作哑，应该有所表示。正在这个时候肖干部来到我这屋子。我求他给我买二百张稿纸，一支木杆钢笔，一瓶蓝墨水，晚上他给我买来了。我问他：“我想写点材料，不知有人看没有？”

“有人看，你写吧！”

第二天早饭后，我开始写第一个题目，取名：国特内幕。包括中统与军统，把中统的特务机关的一切材料，尽我所知，写了一个大概；第二部分写军统，写沿革，人事，活动，组织及经费等。每天上午写六七页，午后写两三页。不断有人来取材料，有一次只写了三页也拿走了。我知道这些材料有人看，于是我更细心地写了。这部分材料写了十多天，共写一百多页。

快要过新年了，我在屋里想，平津快解放了，北平特务组织应该检举。第二天早上我对看守说：“我要和政府人员谈话。”他说可以。吃完早饭就把我提去了。我希望与高一级的干部谈话。在态度上高级干部的修养要好一些，不致于那样盛气凌人，一开口就是“你们……”

我跟着看守到了前面办公大楼，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坐在沙发上，他叫我坐在他对面，我问他：“看报纸，北平与天津快要解放了？”

“对呀，快要解放了，形势发展得很快，你要努力争取呀！”

我原来的意思是，如果干部对我的态度好一点，我就谈北平的特务组织，如果态度很严肃，又骄矜自恃，好了，我就不谈这个问题。顺便要求买几本马列主义书籍。这位干部的态度还不错，我就说了：“现在平津还没有解放，我想把这两个地方的特务潜伏组织写一下，以备解放后，好逮捕。”

“那好，你马上写！用电报的方式写这份材料，材料写好我们用电报拍走！”

我马上回到监房写这份材料，我检举了军统局在北平印制解放区伪币的金城印刷局；又检举了西四牌楼路西龙井和点心铺与特务岳梓宇的关系；北平站另一个潜伏地点在板桥胡同十一号；检举天津秘密组组长于书绅，他在日租界胜得里，利用一个饭馆子作掩护潜伏等。

不知哪一天晚上九点钟，我刚要睡下，一个姓于的看守，把我的门骤然打开：“姓关的出来！”

听这语气很厉害，我穿上大衣跟他出了屋子。我忽然一想，九点钟，不错，我杀你们的人，也在夜里九点钟。不用说这个时候提我，是要杀我！好了，我回头看了他一下，他手中没有武器，不会在后面给我一下子。

出了小红楼又上了办公大楼，进了一个小屋。一个没有见过的干部坐在那儿，他很慢地问：“你们督察处有没有布置在长春的潜伏组织？”

我一边回答他的话一边巡视屋内的一切，看看有没有刑具；过电的东西，灌凉水的板凳……都没有。桌上只有一部自动电话。我心中平静了。大概有人说督察处在解放前有潜伏的部署，我说没有。我建议：“再找董顺球问问，他是当时的情报科科长。”

不一会就回来了，这又是一场虚惊。昨天夜里作梦，梦见政府派人抓我，我藏在一家老百姓的天棚上，被政府人员发现，把我从天棚上往下拉，我怕掉下来，便惊醒了。

下午，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被捕到这里，他戴了一副脚镣，穿一件大黑布棉袍，自己在一个小黑屋。那屋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是重禁闭室。与我是邻居，在我监号的里边。他一咳嗽，我与王焕斌都听见了。他要求看报，看守所给了他一张《长春新报》。他在门口看，屋内没有光线。他拿着报纸念了起来。这是给我们听呢！于是王焕斌问我：“雄飞（李寓春的号）兄来了吗？”

我说：“来了，我方才看见了，脚上戴着东西呢。”

过了一天，张看守长又把李寓春调到尚传道的隔壁，一个很小的屋子。不一会儿，出了事，看守的战士说李寓春把被子撕了，企图不轨！这下子麻烦了，张看守长把被拿走，把李寓春吊在小屋子的门上。怎样的吊法我不能出去看，只听李寓春的脚镣子在空中乱响，显然两脚不是站在地上，并且李寓春用哀告的声音说：“看守长，我再也不敢了，饶恕我吧！……唉哟！受不了，唉哟……”

小楼上的犯人都听见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失败了，落到人家的手里，给上什么刑也得忍受。其实这样用刑还不如打一枪痛快，今天给李寓春来这个，也是给我们看。叫人不寒而栗！在吉林听说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现在可以说不打好人。意思就是说打的都是坏人。我想起前些时候龚秘书长给我看的那个文件，说不准刑讯，那么这吊起来是干什么呢？他们这些举动上级干部不会知道。我看到张看守长就害怕，尽管他没有骂过我，也没有打过我。

我在吉林写过一份简单的坦白，只 20 多页，这次应当写一份比较详细的坦白书。我没有纸了，又得要求买纸。肖干部对我说：“以后写材料由公家发给你纸，不用你自己买纸了。”

不一会儿拿来一些纸，都是黄色的粗纸，仿佛手纸似的。长春解放伊始，什么物资都缺乏。

我从八岁开始写，一边写，一边请示政府人员如何写。写到

1948年在长春督察处杀人的那些罪恶，我有些犹豫，督察处杀了许多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每次都是我在场指挥。可是督察处处长张国卿也参加了呀！这个罪恶应该由张国卿负全责，还是由我负全责呀？我认为自己是中间的传达机关，上边有郑洞国批的公事及张国卿下达的命令；下边由督察主任和一些外勤人员具体执行。督察处没有我一样杀人，至于我呢，是奉命实施。这个责任我不能全负，也不能一点不负。写到这个地方我放下了笔，思想斗争起来。想起在吉林对朱副处长承认杀了四五十个人，觉得太不慎重。现在把我杀人经过……写出来，我的心便忐忑起来。

正在这时几个穿蓝棉制服的干部来到我的监号窗前，头一个高个，我认识他叫王恒烈，他们在我窗前站住，王恒烈说：“这不是关梦龄吗？”他们一齐对我看了一眼，在我窗前走过。看样子王恒烈还是一个负责干部。我心想，好哇，今天你当了干部，到我面前示威来了。我回忆以前：有人密告他是八路，并且说他在长春第一次解放^①给共产党做工作。八路军退出长春时，把四支手枪存在他家。还说他与他表兄高心鲁用长春东兴粮栈作掩护进行地工活动。我根据这些情况与密告，以及我自己的考察，断定高心鲁与王恒烈都是共产党地工人员。由于高心鲁是我的盟兄弟，私交甚好，没有逮捕他。一直到1948年6月高心鲁、王恒烈先后奔赴解放区，我仍没有抓他们，因为高心鲁的母亲是我的义母，因此我不能下手。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我也因为老高家的关系没有下手。但是这些情况我也没有对他们说，我如果把这些话说出来有两种不好：第一，被我的上级知道，“包庇八路，勾通奸匪”，这就是死罪；第二，我说出来，高心鲁、王恒烈二人一定害怕，或者认为我要敲诈他们，那也麻烦。

过去他们做地工，利用我的关系在长春大摇大摆，大查户口，到我的公馆躲避，坐我的车子逛大街，还经常到督察处找我。人们都知道高心鲁是关梦龄的盟兄弟，谁敢不高看一眼？今天说来他们是利用我，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任务。他们胜利了，我失败了。我杀

人太多，罪太大，提他们的关系与我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叫政府认为“邀功”。相反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我必须详细的交待出来，不然他们会揭发我，共产党是不讲人情的。再加上这楼上楼下押着几十个督察处的特务，坦白之后再追到我身上，我再交待就迟了。

关于我在督察处那一段，我没有写应该由谁负责任，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政府怎么看是政府的问题。写了半个月，150多页，交给政府，肩上少了一个负担，可是心理上却多了一个顾虑——都交待了，按照我的坦白，拉出去枪毙够条件。于是又有点后悔，可不写又不行呵！矛盾。

锒铛脚镣

每天晚上趁着看守不在甬道上，董顺球、王焕斌就与我打“电话”。一天董顺球告诉我：“听说陈牧也来了，在四平抓到的。”我说：“早来晚来，早晚都得来。逃走的太少了。”

杨成荣没几天就看不见了，我的这个勤务兵可能是释放回家生产了。

有一天，看守战士把董顺球提出来扫地。他扫到我的门口，趁着看守没注意，他把我的门一开，扔进来一个苹果，一个很好的大苹果。我拿起来擦了擦，偷着吃起来。我一边吃一边想，有家眷在长春倒是好，还有人送东西，我的家在北平，离这太远了。

晚上董顺球在他那屋对我说：“尝尝苹果吧，长春的水果是很缺的呀。”

“你给我这个苹果，我心里很高兴，象征着我的事将来会平安结果。”

“对，一切没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认为脑筋最好的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都会有办法，不会吃亏。你看现在，你睡床上，我们躺在

石灰地上；你吃干的，我们喝稀的。将来更不一样，现在这里分三等犯人，第一等就是你们这几个人，住单房间的；第二等就是我们和楼下的这些人；第三等是前面圆楼里的反革命犯，在那比在红楼还厉害。”

一天，张看守长在董顺球的窗前大发脾气：“给你们报纸看，你们在读报中串供，乱说话，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你们若是吃饭的为什么不守制度？一个人不干人事那就不如吃草的。今天这是警告，要注意！”

我一听，这是指张飞骂李逵，是批评我们这几个监号。可能我与董顺球谈话被他们听见了。犯人嘛，什么都要忍受，我想这还是好的，厉害的恐怕还在后头呢。

我想将来一定有那么一个场面：一个大屋子，上面坐着法官，旁边坐着记录员，另外坐着旁听人，两边站着武装战士。把我提上堂，对我公审。把督察处杀人的事一件一件来审。对于这种局面我抱定宗旨，问什么答什么，一切杀人罪责我一概承认，都是我咎由自取。好汉做事好汉当，决不拖泥带水叫人看不起。给法官找麻烦那又何必呢？怕死不等于不死。

不久，我看了冯至写的一本《平凡的真理》，上面只有两句话我记下来了，“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我振作了精神。我认为到长春一定要枪毙我，但我要往不枪毙的方向争取。

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我又写了沈阳地区军统特务材料 80 多页。还应该写什么呢？要大力争取，不然自己就有生命之忧。

春节过得很难，我又吃一般犯人的伙食了。只吃了两顿有几块肉的菜。除夕之夜，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香烟慢慢地回忆过的许多个春节。

1945 年的除夕，“八·一五”光复后，回到北平。与父亲母亲及弟弟团聚了。作为一个接收人员真是扬眉吐气，趾高气扬。住着大房子，坐着高级车，一切应有尽有。同事和朋友们在除夕的夜晚到我家欢聚，屋内温暖，人声欢笑，父亲看到这样的豪华生活，感到十

分的愉快。第二天，大年初一，一件不快活的事发生了。早晨勤务兵从门口拿进来一张红色的贺年片，递给我一看，是八路军北平警备司令杨成武送来的。我很惊讶，八路军的贺年片怎么能送到我的大门？这是八路与我开玩笑吧？我把这张贺年片给北平站送去，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马汉三（军统华北负责人），他对我说：“不是单单给你一个人，北平高级军政人员公馆门前没有站岗的都给了。我们要针对这件事来布置我们的工作。”

1947年的春节，在北平特务看守所过的。因为华北特务内部闹人事磨擦，勾起我的贪污问题，戴笠把我押了起来。但是由于我在被押之前是军统局北平肃奸委员会的总务科科长，直接管理看守所的总务，这次被押，看守所所长以下的人员对我另眼看待。我受了优待，平日吃的喝的不是一般犯人所能享受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除夕之夜，我与在押的特务赌博，喝酒，闹得也很热闹，并没有感到难过。

1948年的除夕，在长春度过，那晚上，因为逮捕政治犯庞静，一夜没有离开督察处，直到第二天，初一下午才出去吃饭。为了反人民没有过除夕。

今年的春节，我在公安局看守所度过，失去了自由，一切也谈不到了。1950年的春节在哪儿过都是问题。不敢多想，前途异常暗淡。

我把督察处历次杀人的地方绘了一张图，并且把活埋长春大学学生王恩孚等二人的地方一并绘图交给了政府。接着又写军统局华北与西北区的材料。东西好坏可以比较，我交待的材料可以从其他特务的材料中得到证明。

在情绪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书，一些经典著作的书。开始看不进，日子久了，也能看了。有的词句我还要背诵，以备将来好引用。小说也看了几本，不过是当着消遣看的。

过了春节，看守所内的空气有些紧张。一天晚上，张看守长拿着几个锁吊，钉在我们这几个单房的门上。过去是没有的。呵，现

在要锁门！同时到我的屋子，把玻璃窗钉死。这一钉玻璃窗我的心更难受了，不仅仅是不通空气了，而是要对我加强管制了。但有趣的是，他这一钉窗户倒为我解决了一个问题，在我刚到这屋的时候窗外有一个纸条，写着“小心……”我认为是对我“小心看守”，今天晚上因为钉窗户，这张纸条掉下来了，我一看是“小心玻璃！”

门上锁、窗户钉死。天气逐渐的暖和，屋里闷热，浑身发痒，不能洗澡，只在春节的时候推了一个秃头，别的什么也谈不到。我在黄昏的时分站在玻璃窗前，自己小声地念着：

这无尽的岁月，
无期的徒刑，
回忆过去，感到异常的惆怅；
瞻望未来，充满了痛苦与失望。
恐惧与悲伤，
萦绕在我的心房，
许多的问题无法去想……

我想起许多死去的亲友，有的做过大官，是榜上有名的人物，可是一死了之。人生百年不过一死，我这算什么呢？两眼一闭，万事皆休。我想到应该自杀，藏在墙里的那条被服线可以帮我“上天堂”。但是又想，现在还看不出共产党要杀我。那么到看出来的时候来得及吗？每天考虑怎么死，这样的日子是最痛苦的。

在2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有十点钟的样子，我刚睡下，张看守长来了。他把我推醒，叫我拿东西，穿好衣服。我很惊讶，我没有拿东西，我拿出一支纸烟，取出火柴点燃，我对张看守长说：“没关系，我知道有这么一天，一点也不使我意外，希望来个痛快！”过去东北枪毙土匪时，土匪花钱给监斩的人，求他执行时，不用炸子，用一般子弹，把头部穿个眼，不至于把脑袋炸碎。所以土匪临死前都说：“朋友，来个痛快！”

张看守长也没有听明白我的话，说：“没关系，快点吧！”我把东西收拾起来说：“算了吧，这些东西我不要了！”“拿着吧，你不要行

李,怎么睡觉?”

我听还睡觉!便赶忙把东西包好,跟着他下楼了。

到了楼下的最里边的一个监号。一进屋,尿桶的臊味,屋内的臭味骤然扑鼻而来,使人作呕。屋内有四五个人,都睡着了。看守的战士在铁栏杆外边喊:“把他们推一推,就睡在那吧。”

我把行李一放,没有怎么整理就躺下了。心情非常紧张,这是加严了,痛苦的日子开始了。墙角放着一个尿桶,十分难闻,说不定还要长久的闻下去。我为什么到这个屋子来呢?我坦白的不好?有没有交待的被别人揭发了?我藏了武器?翻来覆去地乱想,天亮才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睛。刚一合眼,就喊起床,什么起床?都睡在地板上。大家从地板上爬起来,把被子一叠,坐在屁股下面,不洗脸,也不漱口。这屋共有六个人,有几个人直看我,似乎认识,但我不认识他们。看守的战士用命令的口气说:“不准说话,谁要说话,就处分谁!”

坐了半点钟的样子,门外响起饭桶的声音。我的肚子也饿了。一个战士送进来一个饭桶,高粱米饭泡在白菜汤里。六个铁碗,六双筷子。有的不是筷子,是木棍、树枝。由我们这屋的那个高个儿接过来,把饭桶放在地板中央。六个人围着饭桶,每人拿一个饭碗,拿一双筷子,用碗到饭桶里去舀饭,一个人一碗,我只舀了多半碗。

这屋的规矩是,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打瞌睡,不准乱看,不准藏违禁物品,不准伸腿(只许盘腿而坐),不准……我心想,最好是不准活着,一切都解决了。

吃完早饭,楼下房子的门锁都打开了,一方面往外送饭桶,一方面放便。一个屋子一个屋子,依次到院中的露天厕所大便。外面站了许多武装战士,都是端着预备放的姿势。我看到一些年轻的战士,看样子还没有上过战场,他们拿枪看守犯人,表现得特别紧张。我对这些年轻的战士很害怕:一个战士背手提轻机枪,很不熟悉地退子弹,我害怕他们任意摆弄,走了火,把我们打死。那真是冤哉枉也。

放便时，我们六个人一组，要快跑，跑到厕所蹲下就拉屎，完毕，一齐回来。路上不准左右乱看。但是我看到楼下是十二个监号，南北各六个，中间，四周都是走廊，看守在走廊四周监视。每个屋子一个门，一面是铁栏杆，铁栏杆外面是走廊。假如我从走廊经过，一咳嗽，各屋都会知道我下楼了。

楼下的制度可真严厉，可以说动辄则咎。盘腿面坐，目不斜视。这样坐下去，不残废才怪呢。这样不打不骂真够呛。

我们这屋五个人，有四个人见过我。杨光是军统局绥靖第二大队第二中队长，张逸民是中统局长春区第四分区主任，李中候是长春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小特务，刘新斋是军统局东北特技组的中尉组员，另一个是中统特务姓王。他们说：“都知道你在楼上优待，怎么又把你调普通号来了？”我摇摇头冷笑了一下。自己感到很惭愧，为什么对我昨天优待，今天又不优待了？共产党的事情真是捉摸不定。

一天上午，提我到前楼的审讯室。那个姓郭的与往日不同，进屋就喊：“你不老实！有许多问题打埋伏，欺骗政府。你考虑考虑，还想争取不？你经过的案件那么多，抓了好几百人，你都交待出来了吗？别人交待了，你还在这装没事呢。对你这样的不能客气——碰上脚镣！”

接着事先布置的两个看守，把我叫到走廊，给我戴上了脚镣。再什么也没有说便叫我返回监号。戴上镣不让站着走路，叫弯腰手提脚镣走路，这样可以没有声音。回到监号，同屋的五个人都感到惊讶。我坐到原处思想极度紧张，情绪紊乱，忐忑不安，内心十分怨恨政府。心想，我这是自作自受，谁叫我自首呢？这就是自首的结果。我的脑袋太简单了，这样的下场叫人笑话。陡地，我想起一个日本歌子《秋词》：自己做错怨不得人，自作自己受；兴奋的歌声，热情的泪流，永远没有归期……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这一辈子走错了这步路，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真是羞愧难当，不如死了好。我想起在楼上墙壁里藏着的被服线，可惜没有带下来，自杀都困难

了。活着难受，死又不能死，闹得死不死，活不活，天哪！我关梦龄已到山穷水尽之时了。

我又想，如果我从解放团上火车到沈阳，沈阳解放到北平。我真的走不了吗？难道说长春这么多特务，就没有一个人逃走了？既然有人逃走，我为什么不能？想在共产党这儿工作已成空中楼阁。我自首受了这样的罪，叫军统局的人知道，他们会指责我说：“好哇，关梦龄叛变组织，投降奸匪，把自己同志检举了一二十人，把潜伏组织出卖给敌人，结果他自己被戴上脚镣押了起来，这就是没有骨气的下场！”

千头万绪不知从哪儿反省。晚上睡觉，脚镣把被里划破了；一幅冰冷的铁镣挨着小腿，真是不舒服；夜里小便，还不准脚镣响，要轻轻的拿起来，提着，走到尿桶跟前，慢慢地把脚镣放在地板上，再小便，便完再轻手轻脚的回来。脚镣给我的威胁太大了。

一天夜里，我对身旁的张逸民说：“你修修好，把我勒死吧，我受不了这个罪。”

“拿什么勒呀？”他反问我。

“把我这条毛巾撕成两条，接起来，缠在脖子上，扎一个死扣，一勒，就能勒死。”

“你死了，我怎么办？”

“你装不知道。”

“我看你在外边很有两下子，现在怎么这样糊涂！你想想，咱们俩人紧挨紧睡觉，你勒死了，我不知道，人家能相信吗？”他不同意，又说，“打官司，戴一副两副脚镣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马金刀换来锒铛脚镣，没什么。胜者王侯，败者贼。不要难过，脑袋掉了才碗大的疤拉。你过去怎么押人家了？怎么给人家戴脚镣了？心宽绰一点想，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他说枪毙，就上汽车。振作点，别叫人家看我们太孬了。”

又过了两天，看守把我提到办公大楼。还是那个郭股长，叫我写材料，专门写督察处抓人杀人及我经办的案件。我说我都写过

了，说不行还得写。他叫我到一个大屋子去写。屋里没有外人，都是督察处的特务，有杨绍林、董顺球（他们二人是情报科的前后科长），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审讯主任，接我任督察长的陈牧，少校督察郭子襄等，坐了一大屋子，都在低头写材料。把督察处的特务集合在一起写材料，那是暗示我们，自己不写，别人还写呢！并且叫别的特务知道，关梦龄已经戴上了脚镣，如果谁不好好写，也一样戴镣。这些做法我很明白。郭股长告诉一个战士：“给他拿纸，叫他也写。”我拿了一打纸，坐在靠窗户的桌子旁边，我想了一下，把已经写过的案件又补充了一些。我写几页，郭股长就拿走几页。我一直写了三天，才把这些案件写完。比过去又多又全面。

3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看守所把扩音机打开，播送长春市追悼被害烈士及无辜死难人民大会的现场实况。大会由长春市市长张文海主持。大会的会场设在中央银行前面的广场，也就是公安局的门前。会上陈列着烈士的棺材。许多烈士的遗族穿白戴孝追悼被害的亲人。张文海市长主祭，读祭文，我只记得有：“长春督察处是人间地狱……”接着烈士遗族上台控诉匪特的杀人罪行，要求政府对杀人的刽子手，督察处的特务依法惩办！“点天灯！”“杀人偿命！”“血债血还！”群众的呼声响彻云霄。我在监号听到这些声音很难过，当众痛哭怕人说装假，我偷偷地掉下了眼泪。自己是杀人的刽子手，是指挥特务杀人的元凶，内心不能无动于衷。我想一死了之，良心受谴责，精神上不安，加上戴的脚镣，多方面不好受，不如死了。

大会结束时张市长说：“烈士的亲人要求对这些杀人的刽子手‘点天灯’，这个办不到。人民政府没有‘点天灯’这一条规定。但是政府一定依照法律来惩办这些杀人的凶手！……”

我心想，人民不答应政府，要求惩办我们，我的材料写完了，戴上了脚镣，等着枪毙吧，不被“点天灯”就算便宜了。然而真若枪毙又害怕了。矛盾非常，心绪不宁。

大会之后，我们这屋的张逸民特别恐惧，脸一阵白，一阵青，他

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意思是他的脑袋保不住了。

我说：“你没有我重要，我是注定了的。”

督察处的特务多数都知道自己凶多吉少，死的成分大。在我们这些特务里戴脚镣的不多，只有李贺民、陈牧、印匡时、翟丕翕、郭子襄和我戴了脚镣，别人都没戴。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我们号的刘新斋偷偷对我说：“你不要害怕，我认识周总理。最近我就可以出去。我见着周总理把你的事情一说，你就可以释放了。你心安的等几天吧。”

“你与周总理是什么关系？”

“我的叔父与周总理同学。”

“那好极了，你能把我给救出去，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他这一说，我想起1938年6月在湖北武昌“军委会战干一团学员队政训班”受训的时候，周总理给我们讲课，他讲“第三期抗战与保卫大武汉”；叶剑英给我们讲“游击战术”；郭沫若讲“敌情研究”；田汉讲“话剧宣传”；马彦祥讲“街头话剧”。当时周总理穿着绿哔叽军装，不戴符号，每礼拜给我们讲四小时课。那时他还兼政治部副部长。曾几何时，我们毕业之后就参加了反共，一直反到解放。如果当时去延安，这会儿我也不会是反革命，还可以提一提这些旧事。现在既然反了革命，这些事就不必谈了，否则谈起来更坏，因为听了许多革命理论还反革命，那不是比糊里糊涂的反革命更坏吗？

晚上刘新斋在梦中坐了起来，大声地说：“毛主席！我押在这里了，把我放了吧！”

看守战士把张看守长找来，张看守长告诉他要老实睡觉，他还是念念有词，张逸民把他按倒，他也没有睡。这时，我对他的怀疑了，他莫不是有神经病？或者是假装神经病吧？第二天他不吃饭，一个劲地喝水，嘴里不住地说一些驴头不对马嘴的话，这时我才醒悟，他说他叔父与周总理同学是胡扯。可是我当时还寄予了希望。

电影“顾问”

一个礼拜三，我被提到审讯室。杨股长和一个穿蓝干部服的人在交谈什么。

杨股长说：“关梦龄，我们今天要从你身上了解一些事情。这也是立功赎罪。你要好好地提供。”他说完就对那个干部说，“我还有事，你在这儿谈吧。”

这位干部有三十二三岁，白脸，很瘦。他让我坐下。我戴着脚镣感到很难堪。我轻轻地把脚镣放到石灰地上。地上依旧发出了叮哩锒铛的响声。他拿出一盒纸烟，给我一支，他吸一支。接着他问我的经历。他对我在军统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很感兴趣，问得很详细。他随意地问，也不记录，就像闲谈一样。我观察他的言谈行为觉得他不是审讯案子，而是在我身上找什么罪行。我一边答复他的问话，一边端详他这个人。他是个什么干部呢？

“你写的‘国特内幕’，我看见了，写得很好。你看过《腐蚀》这本小说没有？”

“看过多次，是沈雁冰写的。”

“这部小说写得怎么样？”

“对特务的一切他下了不少功夫，不与特务接触是写不出来那样的东西的。”

“你看《天字第一号》的电影了吗？”

“看过，在1947年2月于北京看的。我在解放前不怎么看电影，因为这个片子是宣传特务工作，一些军统的人叫我看，我才看了一遍。”

“怎么样？”

“作消遣解闷倒可以，从特务技术上说，那是谈不到的。因为导

演屠光启对军统特务知道得太少。编剧的人凭主观想像搬到银幕，给社会上的小姐、少爷们当故事看可以，因为他们不懂沦陷区地工是怎么个搞法。看完之后大加赞赏。可是叫我们这些特务一看，就知道是胡扯，没有价值，既不合情理，也不合特务的活动规律。”

“怎么不合特务规律？”

“比如说《天字第一号》上收音器藏在古瓶里，这是不应该的。古瓶是人们欣赏的东西，客人来，要拿起古瓶仔细端详，十分容易被人发现。通常可以把收音器放在沙发里，茶几的下面。再有，电影上一个情报员化装成有钱的少爷，另一个情报员化装为乞丐，少爷走出公馆的大门乞丐向他乞讨，这个少爷很慷慨地给了他五元钱，这个纸币的面额太高了，应该给一些零钱，别人看到不会惊奇。还有女特务要从沦陷区脱逃，在临走之前，她计划把司令、参谋长都打死，她用了一个离间之计，说这个参谋长通国民党，当司令申斥这个参谋长的时候，她给了这个参谋长一枪，接着大声说：‘您何必亲自打他呢？叫我们去办吧。’

“她这是给外面的警卫人员听的，使外面的人以为是司令用枪打死了参谋长，接着她又要打司令，司令一看她要打自己，也找枪，她匆忙之间给了司令一枪，没有打死。她急忙向外逃脱，跳上事先预备好的汽车，但是没走多远她便被后面的机关枪击毙了。她用这些办法能行吗？不行。应该先用一个离间计，叫司令把参谋长杀了，之后，叫司令送她到一个地方，再把司令打死，自己也逃脱了。这很简单。真如电影那样，把参谋长打死，她自己是走不脱的，击毙倒好，就怕没有被击毙，击伤了被捕，是投降啊？还是坚持？都是不可预料的事情。所以这个片子的特务技术是谈不到的。如果搞电影的能找到一个有经验的特务，了解一些技术，电影会既精彩，又符合特工规律。”

我说这一段话，他一直看着我。最后点了点头，接着他问我：“解放后你们怎么搞潜伏工作？比如一个女特务，原来是指定她潜伏的，可是她看到人民政府号召登记了，有许多特务登记了，她害

怕也不想干了，她要登记。这时她找到她的上级，一个站长，这个站长要对她采取什么态度呢？假如你就是这个站长，我就是这个女特务，你坐在那里，我从门外进来……”

说着他邀我与他一起表演这个场面。我坐到桌子后面的椅子上，他从门外进来，站在我的桌子前面，用吞吞吐吐的声音称呼：“关先生！”

我也演了起来：“有什么情况没有？你们厂子去了新干部没有？”我拿着纸烟，歪着头，两眼对他似看不看地问着，语气拉着长声。

“没有什么情况，就是动员反动党团要登记，我……”

“你什么？不要听这一套！这是诈我们，真的掌握情况，还用号召？难道他们对我们还会有什么客气？你就是胆小！将来你要后悔的。假如我和你一样咱们就不用搞了。咱们的一举一动，上级派人在背后监视呢，如果你在这个节骨眼大意了，你的小命……”我从腰里掏出来一打钱给“她”：“拿去，这是下月份的津贴。”

表演到这儿，我们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各自坐到原来的座位。他又问我：“你们特务里有没有杀鸡给猴看的事情？”

“有，一般情况不用。都知道特务纪律厉害，特务制裁特务也不客气。”

接着他又问了我许多特务的生活习惯、举动、言行，我谈了不少。我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又在特务机关很多年，尤其在北京“北平肃委会”充总务科长的时候，时常接触戴笠，使我对国民党特务这一套有所了解。我毫无保留的对他谈了。我以为他是作家，要从我身上收集素材写一本反特小说，后来我又觉得不像，可能是话剧团的导演来体验生活的。

我问他的姓名，他告诉我：“姓伊，叫伊明。是东影（即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

最后他说明了来意：“我想写一个东西，假设在天津中纺里有一个女职员，她在解放前被人介绍参加了军统局天津站。解放后这

一个女特务看到反动党团登记，她也想去登记，可是特务站长不答应。这仅是一个计划；另一个计划，打算写个潜伏站如何被公安机关发现破了案。你帮助我想一想，怎样才能被公安人员发现？”

我告诉他：“那要看把这个潜伏站设在什么地方？潜伏站都有掩护的商号，商人，从这方面一点一点地深入比较好。”

谈到 12 点了，他要回去吃午饭，临分手时他说：“我下午还要来，我知道你争取得很好，再努力争取，一定很有希望。”

“咳，戴这么副脚镣，一切都否定了。不过不管政府怎么看待我，我是自首的，凭良心我绝不欺骗政府。”

回到监号呆了一小时，心想这样的谈话没有什么顾虑，吸着烟，喝着茶，谈呗。伊明是个导演，他对我说：“我从解放区来，我曾经找过一些军统的人，但是都没有你知道得多。”

我暗道，军统局的高级特务在北满根本没有被捕的，找一些外围分子什么也不知道，当然会使他失望。

下午一点把我提到看守所，杨股长对我说：“今天给你下镣，以后还要好好争取，不要放松自己。”接着一个看守所的人把脚镣给我下了。自己感到说不出的感激，我忙对杨股长说：“以后我一定要继续争取。”

又到了前楼，与上午一样，进了那个屋子，伊明早已等在那里。一见面，我说：“下了脚镣，轻快了。”

“思想上也愉快了吧？”

“愉快了。”

我内心知道，下镣这件事与他从中婉说有关系。

坐下之后，接着谈，他假设了几种方案来破获军统的潜伏站，叫我参加意见。他设计潜伏站用一个饭店作掩护，这个饭店的茶房喝醉了酒，和客人吵架暴露了身份。

我问他：“在破获这件案子的时候，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几分？群众的力量占几分？先规定出来就可设计。”

他说：“群众力量协助破案占四分，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六分。”

我又说了几种情况，他说可以研究。虽不能把特务的一切东西都反映到银幕上，但是银幕上要有特务的东西。我在特务技术，潜伏站的组织、通讯、经费、掩护、化装等方面谈了很多。共谈了三天。最后一个下午，又把军统特务机关的一些活动规律、术语写出来，交给伊明。

过了两天，伊明和另一个干部来到看守所的监号，到处体验犯人的生活。伊明看到我，与我点了点头。他们在看守所呆了三天的样子。

第四天上午又把我提去，谈了特务走路、穿衣服、坐车子的习惯。那一个干部好像是电影演员吕班。我说了许多习惯：“军统特务一般都不戴帽子，留着长发，发上放油，许多人的头发锃亮；衣服在蒋管区都穿藏青中山装，夏天是灰派力士料子的中山装；多数特务身后佩带自卫手枪，皮鞋都是发亮光的；如在沦陷区就要化妆了。特务们走路比较快，两眼向左右审视，走到地方还要向四周看看，这是习惯，特别是外勤人员更是如此。这是防备有意外，好作预防；坐车子，戴笠通常与司机一块坐前座，一般特务也有这样坐的，把警卫人员放在后座。这样坐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有情况在前面能先发现问题，即可指挥司机把车子开走，如果在后座就来不及了。”

伊明叫我学一学戴笠走路，我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又谈了一会，我就回来了。

伊明导演的这部片子（也是他编剧）名叫《无形的战线》，多次修改，演出后受到公安部的嘉奖。1951年长春镇反时，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职员苗佩然逮捕，押在我一个屋子，他说：“《无形的战线》这部片子，拍摄好了之后，拿到北京去审核。片子里有一个审讯员对捕获的特务站长李某审讯的镜头，审讯员对特务站长说：‘你要知道人民的力量是反抗不了的！’说着便用拳头一拍桌子。这个镜头被周总理看见，受到了批评。后来这个镜头又改了。审讯犯人不准耍态度，那样演是歪曲政策。”

我对《无形的战线》采纳了我的一些意见感到高兴。

尝到了犯人的滋味儿

4月23日南京解放，接着全国许多地方相继解放。报纸上大字标题报道这些胜利消息。我没有什么高兴的，认为这些事对我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全国解放能够放我，我会迫切希望全国解放，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共产党与国民党和谈，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太苛了，国民党不干。这期间我看一切事情都从能不能释放出发。

关于国民党失败的问题，在号内反省的时候我细想过：是蒋介石个人昏庸无能吗？是他的部下不好，“一团糟”吗？是政治腐败，贪污混乱所致吗？是军事落后，官兵士气不振吗？国民党执政20多年，一无是处，根本没有一点好的事情吗？这些问题，翻来覆去地想，也想不通。

5月的一个晚上，电灯已经亮了。看守所提刘一之，把他的东西都拿走了，接着在看守所门口给他下了脚镣。在犯人的心中，下镣如果不解走还好，如果下了镣走出大门，那可能是枪毙。刘一之的脚镣下了就走了。第二天夏芳庭也走了。他们俩人紧挨着走，我明白了：刘一之是督察处的上尉侦查员，夏芳庭是长春警察局八分局局长。他们俩人都是暗杀李兆麟将军的帮凶。1946年1月，军统局在哈尔滨有一个潜伏小组，组长叫张伯生。张伯生忽然失踪了，潜伏小组的组员断定是八路军给暗害了。于是就自发的，没有军统的命令，自己作了行动工作。他们选择了一个对象李兆麟将军。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很活跃，好跳舞，各种交际舞会都出席。特务找了一个漂亮女人，是混血儿，叫她把李兆麟拉拢上。1946年3月9日，这个混血儿请李兆麟到哈尔滨道里水道街光明医院楼上见面，李兆麟没有多想就到了那里。这个混血儿与李兆麟饮酒，不一会儿

这个混血儿走了出去，于是，事先埋伏好的刽子手从内室出来，用斧子把李兆麟杀害了。然后，这些刽子手一齐到了长春，转沈阳，又赴锦州。他们在锦州见了东北特务头子文强，文强又给他们分派了工作，这内中就有刘一之和夏芳庭。虽然他俩不是主要分子，但是，他们是刺杀李兆麟将军的成员。夏芳庭在“北平特警班”受训，1947年派到长春警察局，1948年夏升充第八分局长。这次他们二人一齐从长春公安局押走，我想一定是解回哈尔滨，可以说注定死命。

6月的一个晚上，先把李中候从监号提出，过了一会儿又提我。我一进屋，郭股长就大喊：“你每天在号内有什么活动？”

“我没有什么活动。”

“你与张逸民两个人都说了些什么？”

“都是在长春的一些事情，他说中统方面的事情。”

“你是军统，他是中统，在外边你们就认识，现在你们在这里还交换情报吗？”

“根本没有这回事。”我内心非常抵触。

他很严厉的批评了半小时，叫我回到监号立正站着，不准睡觉。我回到监号立正站在铁栏杆边。看守战士对我也严厉起来，不准我动一动。我一再压制心中怒火，我记住“人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这句话，光棍不吃眼前亏，忍耐吧，小不忍则乱大谋。无论如何绝不能因小失大。内心的气愤无法形容。我想起1946年被押特务看守所。当时的看守人员对我十分客气，同囚的特务张霞飞对我说：“你看看守对你多客气，像你的勤务兵。他希望你出去派他一个好差事，伪满时，我也住这个监狱，现在我又住这个监狱。过去因为抗日，现在因为贪污，将来八路来，我还得住监狱，因为反共。我这一辈子住监狱很习惯。伪满时这里押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人，连哈尔滨共产党办事处主任林枫都与我同在这里押过，直到1945年我们才一块从这里出去。当时这里的看守厉害呀，对犯人非打即骂。后来大家对这些看守说：‘告诉你们，你们的洋爸爸长不了，小心你们的后事！你没问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以后他们有点老实了。

据说明朝有一个总兵元帅被人陷害押到监狱，他一进牢房，看守便叫他跪下，并往他身上小便，尿了他一身，他说：“吾曾统兵十万不知狱吏之尊。”在外面不管你是什么王爷、侯爷，押起来都是犯人。”

如今我也晓得“狱吏之尊”了。我想，国民党如果能回来，特务机关又不追我自首这件事，我首先要对看守所这些人予以报复，如果他们跑到解放区，我要布置一个潜伏组去行动他们！这样对我侮辱实在无法忍受。我从下午七点站起，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开饭的时候我的两脚已经肿了。吃完早饭，坐在地板上，两腿麻木，如同失去知觉。自己偷偷地掉了几滴眼泪。自我安慰道：打掉牙吞到肚子里，忍吧。

在监号里最大的困难是大便。每天放便在早饭后，晚饭后。另外的时间有大便要报告看守的战士。看守战士要追问：“为什么在大便时间不大便？现在要大便，挑什么皮！搞什么乱！”先予以批评，再向看守所报告，看守所还不一定有人。有人才能拿钥匙来开门，这就要20分钟。有的时候憋得难受，两手捂着肚子不能站起来。有一次我在开饭时要求大便，报告了半天没有人来。我不敢吃饭，怕吃饭之后拉在屋子里。做了犯人一切都完了，大小便也不自由了。

心里不痛快，不想活。如果能有一场病，病死了，那有多好。我看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要开斗争大会，那时最好是被枪毙，脑袋上一个眼，死不知道怎么死的。

刘新斋两手戴着手铐，还铐在后面。吃饭有困难，大便不能擦屁股。他头也肿，脚也肿。俗语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说男的怕腿肿，女的怕头肿，现在他头腿一齐肿，我看完了。我呢？什么病也没有，想死不能。可不可能在放便的时候假装逃跑？那样看守的战士一定开枪。这个法子也不好，假如一枪没打死，把腿打断了，成了残废，死又不能，活又受罪，岂不画虎未成反像犬。怎么样死呢？每天晚上手淫，无数次的手淫，可以吐血死去。这种法子很慢，传出去太不好听。死，我不犹豫，不要在死时闹出一些下流的勾当，给人们留一些谈话的材料，那就不是好样的。死也要死得漂亮，不

过想不出漂亮的死法。咳，成了犯人还是人吗？

上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不知哪个犯人抓住了一个苍蝇，在苍蝇屁股上塞了一个半寸长的小纸条。这个苍蝇到处乱飞，飞到我们这个监号，我们谁也不敢理。一个看守战士发现了，他把苍蝇抓住，一看苍蝇屁股上有纸条！虽然纸条上没有什么字，还是追问是谁搞的？我们五个人都说不知道。那个战士姓富，他的意思是我的嫌疑最大，他问我，我当然不承认。他一口咬定是我搞的，我又有什么法子呢？同号犯人证明，他也不相信。我心想，我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犯人呀，要整我随你们的便吧。

每天发下来的报纸，一个号一个号的往下传看，但我不敢看。有一天传看报纸，看守战士发现报纸上有个小眼。他追问这是谁搞的？没有人承认，有人说这是原来的，但是不行，就这个问题看守所也来了人，追问在报纸上弄个眼儿是什么暗号？始终无人回答。从此报纸传到我这屋，我不敢看。我怕报纸破了一个口，或者碰坏了一小块，追问起来，三个“为什么”，我是答复不上来的。我宁可不看报，少找这些麻烦。

政府人员知道我们这些特务罪大恶极，诡计多端，认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特务行为，对政府不会老实，在监号必然捣乱。可是怎样捣乱呢？特务的手段是什么？他们知道得太少了。有的干部还不知道军统局这个名词。他们只知道提高革命的警惕性，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我们在监号不敢动一动。其实犯人的真实思想动态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发号施令，不听我的，我就给你吊起来、罚站、戴上手铐。这样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从前，我押过无数的人，拿笔写一个条子就押，从不考虑住监狱的情况，现在我尝到了这个滋味儿。押人者人恒押之，自己命该如此。

我们确实杀了不少共产党人，但是我们对一些共产党人也有优待。1943年1月我在军统重庆特务训练班受训，我们这个训练班是视察人员训练班。担负视察特务工作与反贪污。也就是特务的特务。这个班共29个人，在戴笠公馆的隔壁，后山就是叶挺住的

地方。有一次我们躲警报，到了后山，看到了叶挺。一个同学对我说：“叶挺吃的比咱们好，重庆最近买不到猪肉，可是他还是每餐有猪肉吃。他什么也不缺，只缺一个太太。”那时对叶挺没有罚站哪，可是现在对我们为什么这样呢？我承认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宽大政策”，杀人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共产党人说“不打不骂”，但戴手铐子，吊起来，这是言行一致吗？

一次，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干部找我谈话，他说：“我们有的干部很年轻，甚至有的比你们的子女还小，你们难免会产生对他们的轻视。他们问话，你们不愿多说；写材料有一些句子不写上去，认为他们看不懂。这都不对。我们是有组织的，他们可能看不懂，可是我们有人能看懂。所以你们写材料要详细写；他们问你们话，你们要作到知无不言，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对我谈。”经过那次谈话，对照这些日子对我的处罚，我感到上下不一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6月底的一个上午，郭股长提我到前楼审讯室，他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并说：“这些日子你的思想很消极，什么材料也不写了，也不请求谈话了，你就这样争取吗？你不请求政府谈话，我找你来谈话，你最近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在监号内不守制度犯了错误，受到处罚是应该的，论我的罪枪毙也是应该的，我毫无怨言。”我认可枪毙，也不能接受侮辱性的处罚。脚镣，刑具在某些犯人身上起作用，但是对我不起作用。这一点有些政府人员是不理解的。

郭股长接着说：“今天叫你写一份材料，写军统局的沿革。这个材料你过去写了一个轮廓，这次要全面写一下，有关年月要写清楚。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先回去想一想，明天再写。我回到监房想了一天。对于争取的问题，我反复地考虑了一番，“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这个方向不应改变。现在正在争取的路上走着呢，还没有盖棺论定，因此自己不能半途而废，要大步赶上前去。经过思想斗争，我决定把

这部分材料写好。

采纳了我的建议

第二天，我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写材料。每天写十三四页。从军统局的前身“军委会特务处”^②，戴笠个人给蒋介石做情报开始写，一直写到1948年为止。分人事、组织、活动、经费等。主要的东西没有遗漏，但是我给政府写了一个建议：“这样大的材料，仅就我个人所知太不完整。军统局的特务谁也写不完全，因为地区太广，组织太多，好几万特务。我在东北，对于西南地区的特务就不了解。因此，为了把这部材料写完整，写系统，我建议，把在押的特务，如：印匡时、刘文白、李秉一、翟丕翕等十个人提出来，集体提供材料，一块写。这样就能写出一部比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材料。”

过了几天，郭股长找我谈话，他说：“看了你写的材料，比较具体。印匡时在长春督察处当上校主任秘书，在军统局作过科员，军统局的事他能不知道吗？可是他写‘军统局的沿革’只写了五页。先说蒋介石为什么成立军统局？这就占了一页，后边就说军统局这个番号是怎么来的？其他什么也不写。这不仅是知道的多少的问题，而是肯不肯靠拢人民的问题。你写的那个建议我们看了，必要的时候可以那样做，如果那样做，由你执笔担任主编。”

回到监房心里感到很宽慰，以后还要好好干。可是心里仍有余悸，说不定哪天又把脚镣子给我戴上了？不管怎么样也得争取。戴镣子在他们，争取在我。

7月7日，看了毛主席的新著《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很重要，深入浅出，容易看懂，对我们这些反革命犯很有关系。文章引用的“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我把文章全文背诵下来，作为学习引用，对人也好卖弄。

这些天看不见张看守长了，内心感到很舒服。可能是调走了，由朴看守长负责。朴看守长是朝鲜族人，见人就笑，大家不害怕，有事也敢请求。听说张看守长是共产党员，参加革命年头很多，因为没有文化，只看守长这个工作就干了十几年。他40多岁，在工作上归22岁的郭股长领导。张看守长吃小灶，每天与分局长一块吃饭。这些话是两个看守战士在窗户前耳语我听到的。

我在屋里想，有什么办法能立功进而把我放了呢？我想回家看看，家中是否还住那座房子？才侠与依平（大老婆与二老婆）最近怎么样？父亲的身体如何？这辈子还能不能与他们见面？生离死别，人生如梦，自己摇了摇头。咳，如果1947年不来长春，在北京工作，我就可以跑到台湾，就没有这些事了。军统的人谁能像我这样来个“与众不同”的自首呢？别人跑了，我不跑，结果搞得人不人鬼不鬼。在共产党这方面，我成了最危险的犯人；在军统局方面，我是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徒。俗话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我就是这样处境。有一次一个干部与我谈话说：“你的历史可以清楚，却不可能清白。”

我心想：过去的污点没法子去掉，因为我是特务，共产党是不会信任的。这不奇怪，共产党的叛徒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是如此，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叛徒一贯采取“可以重赏，不可以重用”的原则，比如袁晓轩在共产党的地位还是不低的，可是到军统局却不给他独当一面的职务。再如张国焘，在军统局成了一个小丑。

在8月初的一个下午，郭股长来到监房走了一圈，不一会儿看守所便从各号提出去十多个人，内中有我。我们到了后院，我一看这十多个人都是军统特务，只有李树中是中统的，他是长春市的参议会议长。军统有杨绍林、李秉一、张锡德、董顺球、李海涛、孙静修等人。我们都坐在条凳上。这是干什么呀？没有什么坏事，因为这些人没有戴镣子。

郭股长笑了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开个会，叫什么会呢？叫个进步会吧，因为你们这些人是比较进步的，比较愿意靠拢人民的。

我们很欢迎你们这样做。在长春这个地方人民对你们这些人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同时也是很愤恨的。比如关梦龄，长春市开追悼大会那天，一个苦主在大会上要求政府惩办督察处的刽子手，其中就把关梦龄的名字提出来了！像关梦龄这样的人该死不该死呢？”

“我该死，我死有余辜！”我很激动地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对！你该死。但是政府本着政策办事，关梦龄死不了！他是自首的，在吉林公安机关报到的。从到政府这天开始就积极立功赎罪，检举了潜伏的特务，检举了埋在地下的大小电台；到这之后自己买纸写材料，系统地写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恶。在押的军统局的特务，现在属关梦龄表现好。因此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你们要向关梦龄学习，只要积极表现就有好的结果，用实际行动靠拢人民。”

接着他又讲了许多如何写材料，如何争取的话。听完了郭股长的讲话，知道自己的命保住了，内心感激共产党！十二万分的感激。

开完会回到监号，由于过分的激动至到半夜仍没有入睡。郭股长说话算数吗？这是命令，还是公告？也许是随便说一说？大概是代表政府发表的谈话。我看他不会随便说，因为有这么些犯人听着，将来不兑现，与他自己也不好，对政府更不好。

8月底郭股长把我提出去，对我说：“把你和印匪时，翟丕翕提出来写材料，写的全部材料，由你执笔。”

我说：“我们三个人还是不行，还要提几个人，才能把这部分材料写全。现在这些人还在，如果他们走了，那就不好办了。三个人也是写，13个人也是写，多提几个能写好。”

“那么，再提什么人呢？”

“刘文白、张锡德、孙静修、李海涛、张兆丰、李秉一、陈青波。”我提了这么多人的名字。

“把陈牧也提出来吧，他也能写。”翟丕翕建议。

郭股长没有说什么，我知道陈牧表现得不怎么好。这一点翟丕

翁还不了解,所以他才这样发言,结果郭股长没有理会。

“好吧,你们三个人先在这屋酝酿一下。”

郭股长推门走出去了,屋内只剩我们三个人了。

我问印匡时:“你怎么来的?”

“解放后,我与张锡德到兴安桥的解放团,从解放团解到公安局,也是报到的。没有改名。你来到这,我们都知道,你戴镣我也知道。你从楼上搬到楼下,一咳嗽,我就听见了。现在你的镣下了,我这副镣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下呢?”

我又问翟丕翕:“你怎么也戴上镣了?杨成荣什么时候走的?陈哲呢?邱明瑞到哪去了?”

“你下楼之后,我被弄到圆楼,就戴上了脚镣;杨成荣在春节之前走的;陈哲与邱明瑞都到感化所去了。感化所比这好多了,他们走运了。”

我安慰说:“我们好好写材料,脚镣就能拿下来。”

第二天,郭股长把昨天我要求提的人都提来了,我们一共有十个人。他宣布:“写材料算一个小组,小组长由关梦龄担任,副组长由李秉一担任。由关梦龄执笔负责编改。发给你们烟,只能在这吸,不准带回监号。大小便到楼下。”我们分了一下工,先写军统局的沿革,然后写人事、组织、活动、经费。首编戴笠的发家史。大家提供材料,我来编,叫陈青波抄写,他的字写得好。我们这屋整天烟气弥漫。

戴笠二三事

写了一个多月,关于特务训练班的材料写得比较充实,特别是那几个大的训练班写得很详细,因为这十个人都是那几个大训练班毕业的。自己身临其境,材料比较可靠。其他材料也很多,整理

起来十分费劲。有时候因为一件事的年月日大家争执半天。比如戴笠给蒋介石当中校参谋是1930年还是1931年？

我写了一个小册子叫《戴笠轶事》，把戴笠生前的一些特别的事例像写小说那样写了出来。比如他的嫖是突出的，只要他看中了，他就要睡觉。军统局职员的老婆，军统局的女特务，他朋友的老婆，以及舞女、电影明星，太太呀、小姐呀，他见过面就找来，找来就过夜。他的嫖也赶上军阀张宗昌了。我把知道的事情列举了几件：

军统局人事处一个科长叫李修凯，他老婆是家庭妇女，长得有点姿色，住在戴笠公馆的附近。有一天戴笠坐轿子从李修凯门前经过，一眼就看见了李太太，于是就派副官把李太太强制请来，不用说在那过了夜。

李修凯还有两个小孩，妈妈走了，乱闹。李修凯下班，听说自己的太太被戴笠找去，知道被强奸无讹。他就坐家等着，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李太太才回来。她一进屋，李修凯就拿把剪刀把她的头发给剪光了。由这儿两口子的感情破裂了。李太太被强奸了，丈夫不理她。她整日闭门不出，羞愧难当。同时李修凯也气病了。戴笠听说李修凯病了，便派人送去药品。李修凯憋着一肚子气，无法发泄。在抗日战争胜利前，李修凯把太太送回原籍，又娶了一个老婆。无形中把前妻抛弃了。

再有，汪精卫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军统局处长丁默村投伪，给汪精卫当特务头子，在上海成立特务机关。这样一来了默村对军统在上海的活动构成了威胁，于是戴笠计划把丁默村杀死。他物色了一个叫朱小姐的，此人在上海有许多社会关系，人长得也漂亮。戴笠把她吸收进来，给了许多物质，并且和她发生了关系。过了一个时期，朱小姐出现在上海市的高级交际场所，并且认识了一些贵夫人、小姐，因此，也就被丁默村所认识。丁默村本是酒色之徒，一见朱小姐以一个没有伴侣的小姐出现，丁默村就与她接触，追逐。朱小姐没有马上答应丁默村，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朱小姐把自己带的行动组布置好了，才与丁默村同居，成了丁的太太。又过了一段

时间，戴笠命令朱小姐杀死了丁默村，朱小姐没有遵照命令行动。最后戴笠来了一个电报，大意是，如果不立即执行，即按团体纪律制裁，这使朱小姐没有办法不行动了。

行动前一天，朱小姐指示她的行动组：明天12时零分，由大新公司正门出来一男一女，女的穿红色半截大衣，左首有一个男人，把这个男人击毙。

第二天上午，朱小姐让丁默村与她一同到街上买东西，丁默村答应了。他俩先到别的地方逛了逛，11点钟的时候到了大新公司。朱小姐这时也有些紧张。她要买一个很贵重的钻石戒指，需要很多的钱，丁默村没有犹豫就给她买了。这样一来，她认为丁默村对待她很好，决定不行动他。于是她在大新公司又买了一件蓝色呢上衣穿在身上，把脱下来的红上衣包起来，走出大新公司。

她的行动组没有等到穿红上衣的女人，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于是马上撤离了现场。丁默村与朱小姐回到公馆之后，丁默村马上派人把朱小姐关了起来。丁默村对朱小姐说：“你和我来这一套？老子干了一辈子工作，你的这点东西还能瞒得过我吗？你不说实话，我就让你活不了，也死不了，叫你活受罪！”

朱小姐无奈把戴笠派她的任务真实告诉了丁默村。最后，朱小姐竟耍起娇来，说：“如果我真想打死你，我就不换上衣了，我不想打死你，你反而要打死我，你打死我好了……”

丁默村没有把她打死，但把她这个行动组破获了。无奈，戴笠又派人到上海把朱小姐杀死。

这就是戴笠对女特务的先奸后用，再处死的例子。他把女人当玩物，他是个禽兽，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有的女人认为“戴先生爱上了某某小姐”，那是对戴笠没有看透。

1942年3月我在军统局主办的“西安查缉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受训。一共二百多人。戴笠专程从重庆到西安主持我们的毕业典礼，并且亲自分配工作。他在人事上，对训练班很重视，非常相信他的学生。训练班毕业，他尽可能到班讲话及分派工作。没到西安

之前，他听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说，西安开源寺妓馆有个叫妹妹的妓女，长得很漂亮。到西安之后，戴笠办了一些公事，晚上，他自己到了开源寺。

开源寺是一座古庙，后来改成妓馆。里边都是江苏扬州的名妓。进了开源寺，给他做警卫的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队长马德皋马上跟了进去。各妓馆对马德皋很熟悉。戴笠一找就找到十七号院。他进院把帽子往下拉，大衣领子立起来。一进门就叫妹妹，伙计把他引进妹妹的屋子。妹妹不认识他，戴笠自我介绍说：“我姓王，商人，跑单帮的。从上海到西安，来这儿玩一玩。”

戴笠既不喝茶，也不吸烟，这是他的生活习惯。他在那与妹妹对话，他问一句，妹妹答一句，戴笠说：“你这套家具颜色不好看，明天我给你买一套。”“谢谢吧，用不着。”妹妹认为他吹牛，很讨厌。这时马德皋在门口的一个屋子坐着。妹妹过去，马德皋问妹妹：“屋里有客人没有？”

“有一个，他说是商人。唉哟，那样子凶得很呀，讨厌死了。他不走，说要在这儿过夜。天哪，我不留他！”

“这个人很有钱，我知道他是河南的一个大经理，在上海开绸缎店。他认识宪兵团的一个班长，你如果不留他，他打你们，我可不管。留下吧，他有钱，多给你钱那有什么关系？他住一夜又不与你结婚，管他凶不凶。”

妹妹被说服了。吃完晚饭，院中的伙计发现门前有许多人在来往地转悠，伙计赶忙报告了妹妹，怕出事。妹妹这时正在洗脸，准备睡觉，她自言自语地说：“不晓得干什么的？有几个人老在门前转悠，要打架的样子。”

“那好办，你到门口，叫他们回去！”

“唉哟，我可不敢。”

“去吧，你到门口一喊，他们就散了。”

妹妹到了门口喊了一声：“你们回去吧！”不一会儿，门口的人都不见了。马德皋自己带着几个喽罗在十七号的院外警卫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戴笠回到自己的住处，这一夜戴笠给妹妹六千元钱，等于二两黄金。第二天晚上又去了一趟，给妹妹买了四件衣料。妹妹始终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物，只知道是个大官。戴笠走后我们到十七号院去玩，大家问她：“那个河南商人最近还来不来？”

“弗晓得！”

再如，1945年“九·三”之后，戴笠到北京，亲自主持“肃奸”。既抓共产党，也抓汉奸。戴笠在北京住他朋友吴泰勋家，吴泰勋的老婆陪他过夜。这种卑鄙的勾当特务们都知道。有一次开晚会，找XXX唱戏。当时我是“肃委会”的总务科长。先唱了一段《凤还巢》，后来宋子文又点了一段《金玉奴》。唱完戏，戴笠不叫走了。那夜就把她带到他的临时公馆过了夜。这样的事，我们办总务的特务都要预备汽车，预备饭，所以知道得比较详细。

这样的材料我在小册子写了几段，多写没有必要。

戴笠用人的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先给你们官做，如果做不好，我就要把‘官’的上面加一个竹字头，变成‘管’；如果管也不行，那就不客气，把竹字头拿下来，旁边加一个木字变成‘棺’！”所以戴笠好押人，为一件小事也能押起来，这就是他所说的管。必要时他还杀人，就是所谓“棺”了。

他有一个副官对他这种嫖的生活很反感。有一夜时间很晚了，他叫副官坐车去接女人。把女人接上汽车，这个副官就当着女人面骂起来，意思是骂戴笠半夜三更叫我们到处找“破鞋”。这个女人见了戴笠把这件事说了。戴笠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报告，说他的副官勾通宋子文的副官贩卖鸦片，应予以处死，就这样这个副官被杀了。

在用人方面，还有一个鱼鹰政策，他说：“饱了的鱼鹰不干活，吃不饱也不能干活，只有饱与不饱之间才能干活——对待我们的部下，不能叫他们太有钱，也不能没有钱。”

小册子里，我知道的，加上大家知道的，写了30段，都是短篇的东西。

每天写材料，每天写工作日记。记录当天写了多少材料，谁提

供的，有什么特殊问题。然后一一呈报。我在呈报时从来不汇报某人的缺点，何必那样呢，他们不好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坚持隐恶扬善。我们每天谈的许多事情也从不反映，因为我就是好谈者之一。

血债血还，杀人偿命

10月16日，星期日。吃完早饭，就听着守到一号监房喊：“16号出来！”我们知道叫的是陈牧。他戴着一副大脚镣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把我们这屋的门打开，我心想，陈牧提走了，这回该提我了。我要起来，看守说：“不找你！”又朝张逸民一指：“找你，出来！”张逸民穿上鞋出去了。我心中暗想，有什么重要的审讯礼拜天还办哪？到吃晚饭的时候陈牧先回来了，接着张逸民也回来了。张逸民精神紧张，脸色苍白，饭只吃了半碗。饭后，张逸民坐在我身旁，不停地摇头。我问他：“干什么去了？”

他说：“把我叫到局长室，一屋子干部。问我的一些罪恶；问经济大药房案件；问在伪满的活动；问我在长春杀了多少人？我说没杀过人。他们说因为我搞的情报，以致破了案子，都要由我负责。这么一来我就危险了。问我话的干部很严肃，其他的人不说话。情形不乐观。回头，又叫我把这些问题写下来，我写了两个小时。写完之后又拿去看，看回来又叫我补充，咳，不好办哪。”

我劝解道：“没有关系，不要难过，有问题就交待，他要杀我们，哪件事不能杀？他要不杀，你多坦白个十件八件的也不会杀，反而说你坦白彻底。”

我总觉得张逸民没有我的罪大，他在伪满是个警尉补，在解放前是中统局长春区的一个分区主任，地位不高，责任也不大。但是他收集的经济大药房的原始情报，这一个案子就杀了六七个共产党的地工作人员。还听说他在伪满时对老百姓很厉害，是长春老百姓

最仇恨的“三张二栗”之一（“三张”，即张效九、张逸民、张耀先；二栗，即栗宗元兄弟二人）。他这“一张”地位虽不高，坏事却没少做，他的老婆就是霸占别人的。还有一件坏事简直不好说出口，伪满时张逸民抓住了女共产党人，用一条大绳子在阴户下边前后拉，把阴户拉烂，然后用洋蜡把阴毛烧掉，最后强奸，杀害。这些残酷的行为我也感到过分，要杀就杀，用不着这样。我也杀过女地工作人员，但我不像他这样残忍。如此看来，他的案子很不单纯。礼拜天干部办公，又来了那么多的人，不一般哪。我想，今天找张逸民，说不定明天就会找我。自己掐指一算，1948年10月17日长春解放^③，今天是1949年10月16日，整整一年。这一年，国内外有了很大变化，我自己受了不少的折磨与考验，今天还能活着，真不容易呀！可是将来会怎样呢？想了许许多多。

第二天是10月17日，长春解放一周年。天气阴暗，刮着凉风，仿佛要下雨似的。早饭后，我以为照例会提我去前楼写材料，但是没有提。不一会儿，看守的战士端着枪，表情很紧张的样子，来回在我们的窗户前监视着。这就预示着将要发生不寻常的事情。接着把玻璃窗户里面的防空窗帘（一层黑纸）也关上了，这是因为这些窗户靠大街，怕我们往大街上看，可是大街上什么也没有哇。我坐着想着，今天是长春解放周年纪念日，也许……我想起3月份追悼大会的情景，那句“血债血还，杀人偿命”的口号，不能不使我害怕。我认为开大会不大好，一枪打倒在这屋算了。否则不如袁家佩、吴殷强、孙伯宇等人，他们病死在这里，政府给埋起来，外面人不知道，就算完了。可是郭股长对我说的清楚，“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啊，这句话犹在我的耳鼓。郭股长不会说瞎话的，我应当相信这句话，为什么偏要不相信，给自己增加烦忧呢？

看守所的人来到监房，监房异常肃静，一点声音也没有。看守手中的钥匙一响，大家的心一跳。一号监房的门打开了。

“16号出来！拿着东西！”

接着脚镣子响，陈牧走出了监号，在看守所门口下了脚镣。铁

锤砸砧子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下完镣，没有声音了。接着又叫 11 号监房：“71 号出来！拿着东西！”

71 号犯人是印匡时。他和陈牧一样在看守所门前下了镣。我以为这回该叫我了，心中忐忑，无法形容。真的，看守所的人往我这屋子走来了……却在我的对门站下了，把郭子襄叫了出去。郭子襄的动作很慢，因为他戴的脚镣太重。

“快点！”看守催促道。

郭子襄戴着那副大镣哗啦、哗啦地出去了，他也在看守所门前下了脚镣。下了脚镣能轻快吗？也许轻快一阵儿。

郭子襄的脚镣下完了，看守所的人直奔我这屋子，到门口开锁……我立刻站了起来……看守战士在铁栏前面怒斥道：“你要干什么？老实点！”我的监号打开了，看守指着张逸民说：“你出来！拿东西！”

张逸民急忙把自己的衣服包拿起来，到门口穿上鞋，走了。我想不会叫我了，如果有我，会与张逸民一块叫出去的。

这四个人走了，监房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静。陈牧与印匡时的号数犯人都知道。到我这屋没叫张逸民的号数，只说“你出来”，犯人们很可能以为把我叫出去了，所以我咳嗽了一声，告诉关心我的人：我没有走。

他们这样走没个好，是开斗争大会吧？什么场面呢？想不出来一个轮廓，也没有具体的听说过。小说里有斗争地主恶霸的描写——大会上要控诉地主的罪恶，然后宣判等等。如果要控诉陈牧，他的罪与我的罪差不了多少。

陈牧是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当时朝阳大学法律系是最好的。他毕业以后，入军统的“黔训班”受特务训练，以后到沦陷区干潜伏工作。1946 年调到长春督察处充侦查室中校主任，1947 年冬因贪污被撤职，押了二个月。释放调充吉林组副组长。他没到吉林，仍住长春。1948 年 3 月督察处的审讯工作忙，副处长张国卿念他是“黔训班”的同学，叫他协助审讯。4 月，张国卿升为处长，又把陈牧调

回来，仍充侦查室主任。陈牧与军统长春站站长项遁光是同乡，都是辽宁开原县人，所以项遁光对陈牧再回督察处也不反对。

陈牧吸食鸦片，为人阴险毒辣。不说别的，他与老婆吵架，操起椅子打过去，把老婆的头部打出血。这件事就发生在解放前的半个月。对老婆尚且如此，对别人就可想而知了。督察处的人，凡是他领导的特务，如侦查室的人，看守所的人，都怕他。他爱发脾气，接着就打人。看守所所长石玉璞常挨他的耳光。石玉璞对我说：“给我调一调吧，我的能力实在不行。”他不是能力不行，是怕挨陈牧的打。

对自己的人还这样，对犯人就不用说了，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扒皮”。

1948年4月，他到长春大马路重庆饭店去吃便饭。重庆饭店在长春是一个比较大的饭馆。经理姓庄，是个很活跃的商人，认识长春不少高级官员，在警备司令部里也认识不少处长和科长，但督察处他不熟悉。陈牧要了两个菜，不合口胃，价钱还贵。陈牧发了脾气，茶房下楼把庄经理找来。庄经理排解一番，陈牧仍不讲理，庄经理就与陈牧吵了起来。陈牧一生气拂袖而去。回到督察处，陈牧把政治犯的案卷拿出来查了查，接着就从看守所提出一个新抓来的政治犯，问这个犯人：“你从哈尔滨到长春，见了几次庄经理？庄经理给你几份情报？”

这个犯人答复不上来，于是用刑，把这个犯人打得糊里糊涂不能不“承认”。于是陈牧就派人把重庆饭店庄经理抓来，抓来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先把庄经理重打一顿，然后押了起来。

第二天上班，陈牧对我说：“昨天夜里审讯，一个八路地工人供称重庆饭店庄经理与他有关系，并且说庄经理最近要到哈尔滨去，我怕他逃走，当时没有来得及向您报告，就把他抓了来，现在我补一个报告。”

按督察处规定，未经督察长批准是不能抓人的。他这样说，我因不知内情，就同意了。他又对庄经理百般拷打。庄经理家中托

了许多人，以后又托到我这儿，我告诉陈牧把庄经理释放。这一押，重庆饭店关门了，庄经理花了很多钱，一下便垮台了。庄经理被释放之后，对人说：“这回我才知道督察处的厉害！简直不讲理，叫人没有法子活。”

像这种无中生有的方法，是一般特务所想不到的，可是陈牧不但想得出来，还能做得出来。

再有，陈牧的审讯“本事”极强，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对我说：“什么案子，只要到陈主任的手，就能审得出来，审讯能力比法官强得多。”

陈牧的确比法官有办法，他能把被审的人绕在里面。比如审讯地工人员：“你到解放区把长春的物价说出去了吧？谈谈物价，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没有什么关系？”

对方没有考虑其他，就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到了陈牧的笔下就是“多次往返哈尔滨与长春之间，收集我方经济情报，调查物价，供给奸匪……”被讯问的人还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已被签处死刑。类似这样的审讯多得很，我也懂得不少。

陈牧在1948年审了一个地工案件，内中有一个长春大学的女学生杜鸣兰。由于这个案子不能构成“奸匪”之罪，原始情况也不具体，就把杜鸣兰等人开释了。到4月，办了一个政治案件，又牵涉到杜鸣兰。怎么牵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陈牧故意牵涉的？不能肯定。这个案子要结案的时候，一个晚上，陈牧把杜鸣兰提出来，威胁要处死她。杜鸣兰哀求他，他就把杜鸣兰强奸了。结果这个案子多数人被杀，杜鸣兰没被杀。这件事，南京来密令，叫我查。我包庇了陈牧。特务们不满意：“抓到八路应该杀，不该强奸。强奸女犯，纵放八路，是犯团体纪律。”

陈牧的罪是数不尽的，还有一个我始终不明白的案子。1946年一个共产党机关干部从哈尔滨来到长春，他叫李文宣，他老婆叫韩瑛。到了长春之后，说是向国民党投降的。督察处把李文宣转送到沈阳东北行营二处，该处处长文强把李文宣又派到长春督察处

工作，并叫从优叙用。督察处便给李文宣一个中校侦查员的职务。1947年冬，督察处处长由安震东接充，陈牧对安震东不满，说：“安震东不学无术，什么也不懂，连公事都不会批。”类似这样的话很多，李文宣报告了安震东。安震东就借陈牧贪污把他押了起来，并且撤了职。到1948年2月，安震东升充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督察处处长由副处长张国卿升充。张国卿与陈牧是同学，私交甚好，于是又把陈牧调回督察处。陈牧说李文宣是假投降，列出许多理由。他对我说：“李文宣不是真投诚，第一，他在侦查案件时，对刑事案件往死里追，看上去工作很努力，可是对奸匪案件，他总是审不出来。到他手的政治犯就签释放。除夕的晚上，您在场，女八路庞静这个案子，原情报说她从哈尔滨到长春，结交了一些新一军军官的眷属作为掩护，以便收集我方各种情报。李文宣对庞静的讯问是这样问的：‘你到长春干什么来了？你有没有组织？’这样问犯人是给犯人开脱，应当问，‘你在长春先后收集了多少份军事情报？’或者问，‘你在长春什么时候开始收集情报？你把情报收集好了之后怎样送走的？’第二个问题应当问，‘你们小组有多少人？’或者问，‘你领导几个人？’‘你归谁领导？’不能问你有没有组织？这事，你在场还对他申斥了！这是他的可疑的地方；第二，社会关系复杂，他每天外出，东一趟西一趟，乱跑一阵。因为他家住在督察处院子里，外人不敢到这里接头，他只好到外面去。我听说他有一些朋友是从哈尔滨来的；第三，他的钱很充裕，如果不是有人接济他，他不会比我们有钱。根据这些可疑之处，我说他是假投诚。”

我听了陈牧的这些话，觉得似乎有道理，我对陈牧说：“再好好调查一下。”接着陈牧又到张国卿、项迺光那里游说。造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形势。到了3月，张国卿、项迺光及袁晓轩几个人一研究，决定把李文宣秘密处死，（这件事我不知道。）决定好了之后，给南京保密局去了一个电报，南京回电照准。

3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我一进办公室，军用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耳机，对方问：“你哪儿？”我答：“督察处。”“你是什么人？”“我

是勤务兵。”“找你们处长说话。”“处长不在。”“请督察长说话。”“也不在，你有什么事？我可以回来告诉他们。”

“你们的人在卡哨外，我们新7军38师的防地上放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你给处长公馆打电话吧，他的电话是××××。”

我放下电话，心想又行动什么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又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加多问，免得麻烦；再一想，如果我们督察处的人在外搞出事来，我能没有责任吗？况且我们这些人都是亡命徒，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都敢干。我想给张国卿打电话问一下情况，但我又犹豫了。

第二天一上班，张国卿对我说：“李文宣是奸匪派过来的，昨天下午把他行动了。”

“怎么布置的？”我问张国卿。

“昨天下午我把李文宣找来，对他说，‘袁晓轩有一些部队在南关外，叫我们派一个人去给这个部队讲话，你去吧。袁晓轩也派两个人同去。’说完又给他拿了一些路费，打发他与王厚甫、刘士培二人一起走了。他们出了卡哨，走到无人的地方，王厚甫在李文宣身后开了枪，枪一响新7军的士兵来了，把王厚甫、刘士培逮捕，带到一个团部。后来给我打电话才把他们二人放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越听越不满意，作行动不通知我，难道我还能泄漏机密吗？张国卿说：“昨天找你没有找到，听说你到中央银行去吃饭，现在你要做善后的事情。”

过了两天韩瑛来见我，她说：“文宣去了几天也没有回来，不知是怎么的了，督察长，您有信儿吗？”

“据说他到那个部队的晚上，八路派不少部队进攻，他被俘了。我怕不可靠，今天派人去调查，证实之后再告诉你。不要着急。”

韩瑛是哈尔滨有名的歌手，红极一时的韩小姐，后来嫁给李文宣，生了一个小女孩，才一岁。今天我看到韩瑛眼泪汪汪，心也有点难过。我这样欺骗她感到太不应该。

过了几天，她又来找我，我对她说：“没有调查清楚，家中的生活，我告诉总务科陈科长给你想办法。”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个条子，叫总务科给发二百斤小米及李文宣4月份的薪饷。这样又把她骗了一次。以后韩瑛又来一次，我对她说：“八路抓去也不会杀了，将来我们抓了八路的干部和他们交换俘虏。”到6月份，韩瑛从督察处的职员宿舍搬出去了，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丈夫被杀了呢？

陈牧害死的人多了，今天如果真枪毙他，我认为很公平。

如果印匡时被枪毙，我认为是陈牧咬的。陈牧充侦查室主任时，一切公事皆要经过秘书室复核，就是说要经过印匡时修改文稿。有的时候印匡时把陈牧的稿子也给改了，陈牧不同意，俩人便闹意见。张国卿与我给他们从中解说，也没有使他们和好。印匡时认为“陈牧自以为是，有的地方不通，我当然要改。不能把公事拿到别的机关，叫外人耻笑我们不懂公事。认为督察处无人。”其实印匡时只在公文上咬文嚼字，其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空牌位。但是按例行公事他需要在这些抓人杀人的公事上签字。这次被捕，陈牧便咬他一口，陈牧在坦白时说：“我签的杀人公事，都要经过印匡时审核。他不同意，我的公事不能出手。”这样说就加重了印匡时的罪恶，又加上印匡时坦白得不好，就注定了自己必死。还有郭子襄，我第一次作证，就是郭子襄的罪恶。

有一天，郭股长把我提到一个屋子。我进屋一看是郭子襄，督察处少校督察。他戴着一副大脚镣，脚镣上还有一个铁球。

郭股长对我说：“关梦龄把郭子襄的血债说一说。”

“1948年3月他在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充少校参谋时，在米沙子抢老百姓粮食，打死了两个老百姓；1948年7月初，督察处在南岭秘密杀害地工人员十人，有他在场，是我指挥的……”

“郭子襄听见了没有？”郭股长问。

“他说有，就有，反正我没有杀过人。”他表现很顽固的样子。

我说：“郭子襄你到今天还抵赖什么呢？我们杀的人都挖出来了，杀人的刽子手多数被捕，你还这样顽固，没有好处。”

我在讯问记录上签了名字。在事实面前还如此抵赖，郭子襄可谓是个顽固蛋。

他们三个都是督察处的。如果今天枪毙，督察处就被处决了三人。

我在屋子里看到窗外的天空，阴暗凄凉，使人感到忧郁。至到晚饭的时候，看守战士才把黑窗户打开，他们脸上的表情也不那样紧张了。这一天不比寻常，真不容易过呀。

第二天早饭后，又提我到前楼写材料。

陈青波说：“早饭后，看守所把《长春新报》发下来，我一看，开大会枪毙人，有五个。一个工人说，给这些人点天灯也不多，这条消息我还没看全，看守所的人就把报纸收回去了。”

“我们小楼提出去四个，陈牧、印匡时、郭子襄、张逸民，那一个是谁呀？”我问。

“姓苏的，是建军的土匪，听说这个家伙的血债很多，昨天圆楼只走他一个。”李秉一说。

大家都感到很空虚，坐下来写材料，心老是沉不下来。

“咳！印匡时是贵州人，一把骨头扔在了东北。”我感叹道。

李秉一也很恐惧，解放后他潜伏在一个大车店，在那儿被捕的。他说：“在大车店把我抓着，用木棒子把我好一顿打。我是被捕来的，所以危险成分多。”

在座的九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危险，我最后说：“好了，咱们不谈这个，写材料吧。”

写材料，一个接一个

一个材料写完了，又写另一个材料。郭股长要我们把长春的军统和中统组织制成一个表。军统的有我、李秉一（保密局长春站秘

书兼人事主任),中统的有李树中(长春参议会议长)、李芳春、徐克成,还有一个日本特务叫竹中,专门能制表,共六个人完成这个材料。十来天就写完了。写完材料的这天下午,我们等着郭股长的吩咐。11月,天气冷了。我倚在楼窗看着大街上的行人,十分羡慕。大马路上的汽车不断地奔驰着。想到一年以前,我出口是令,长春这个城市,我可以一个命令把全市交通封锁起来;警察、宪兵、特务,一齐在督察处的领导下进行户口大检查。可是现在,我大小便都不得自由。人哪,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

郭股长回来,叫我们把个人的东西搬到小红楼的一个大房间。他对我们说:“这回小自由,在屋子里可以随便活动,看书、写材料都行。关梦龄这回不用照像了吧?(我曾说在监号里坐着,一动不准动,等于长期照像。)这是对你们的宽大,与别的犯人不同,你们要知道。”

郭股长走后,我对徐克成说:“咱们写一个决心书吧,前一段是感谢共产党对咱们的宽大;第二段写今后一定要立功赎罪,努力争取,回报政府的宽大。”

徐克成说:“你起稿吧,我填写。”

我拿起笔来就写:“我们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犯,深知百倍努力也不能赎罪于万一。但在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下,我们得以复生。感激之情无法形容,今后只当……”写了两页。由徐克成用仿宋体复制两份,一份呈给政府,一份我们贴在墙上自勉。

12月初,我们从楼上搬到楼下的七号监房。现在楼上楼下的犯人很少,都走光了。军统这些特务除了我一个人,各屋都空了。楼上只有一个尚传道,楼下还有王心一等几个少数民族军统电务人员。他们都到哪去了?徐克成说到吉林去了。这么多的人到吉林?我无法判断。

有一天郭股长与我谈话,我说:“陈牧他们五个都枪毙了,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们怎么知道的?”他问我。

我就把写材料时候，听陈青波说的那些话说了一遍。接着我说：“枪毙的这五个人，论地位都没有我高，论罪恶也不一定比我多，只是陈牧严重。他们都枪毙了，我还不应该枪毙？我没有死，这是政府的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我内心充满感激。”

“你有这些认识是好的，但是枪毙与不枪毙不在反动职位高低。反动职位高肯定罪恶大，但是与争取的情况，靠拢人民的表现都有关系，看问题要全面，逐渐你就会明白了。”

接着他又叫我与徐克成绘制长春的各特务机关的系统表。表的内容都是政府拟好的，我们照写。徐克成的字写得好，他写的仿宋字如同印的一样。他写，我校对。共有 30 多张表，每张表上都有阶级、职务、姓名，被捕的有“△”号，未捕的没有记号。郭股长对我们说：“你们看到这些表，不许乱讲。”

这些事知道不应该讲，这是政府的内部材料，政府叫我们整理是相信我们，也是一般犯人所不能做的事情。自己又想，这样事做多了，是不是能放我呢？不怕我把这些机密带走吗？于是又有了疑惑。

我们这屋五个人，日特竹中是日本关东军的中尉特务，“九·三”之后，军统的军事联络组组长刘精一留用了他。他的俄文好，在伪满时期做苏联的情报。

徐克成在伪满时期给汉奸于静涛当秘书官，于静涛是北满合江省省长，徐克成的日文好，当翻译。竹中说：“徐先生的日本话与东京口音一样。”

李中候是小特务，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喽罗。不知怎么回事与我们关在一起。大概交待材料表现好，这个人什么也不懂。

李芳春是中统局长春区的分区主任。这个人一身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不像一个中国人，真可气。他的日本话虽好，但赶不上徐克成。伪满时期他受的奴化太多，中毒太深。

快过新年的时候，我与徐克成说：“我们住这样舒服的屋子，像小办公室一样，有书看，有烟吸，在屋内有自由。我们应该用行动来

表示对政府的感激。我提议，我们检举揭发长春的一切坏人，不限于军统、中统这两方面的，伪满的特务、青帮头子、地主恶霸、日本翻译、建军头子，都检举，以此迎接 1950 年的新年。”

徐克成、李芳春、李中候都同意。于是我们就开始写起这方面的材料。他们比我写得多，因为他们在长春的社会关系多。这份材料写得较好。郭股长认为还可以继续写。

要过新年了，我们希望能吃点肉。新年果然吃了两顿肉。年算过去了。我说：“年好过，节好过，日子难过：出有门，入有门，回家无门。”

过了新年就是春节。除夕，郭股长调李中候到 11 号监房，徐克成调到一号监房。我听见了他俩的咳嗽声。过了两天，我明白了，他们到监号是去做工作的。在旧社会这叫“坐班探”。我心想，李中候懂狱侦技术吗？没叫我去，是不是自己改造不如他们？内心不愉快。

大年初一，早晨吃高粱米饭，炖白菜帮子。春节的肉在除夕以前就吃了。听说大厨房锅少，先叫我们过春节，到了春节，干部改善。想到活了 34 岁，大年初一早晨吃高粱米饭炖白菜帮子，这还是第一次。然而作反革命犯不也是第一次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人作异客的心情，今天在这作犯人更加倍思念亲人了。过年家人不能团聚，自己被押，亲友自顾不暇，门前冷落，势所必然。家中凄凉景象可想而知。想到 1946 年的春节，我以接收人员的身份回到北京，自己兴高采烈，家中喜气洋洋。今天共产党的干部过春节一定是举家团圆，欢天喜地。我，我的家则是在悲哀失望中度过佳节呀。我想得很多，最后我想到被我杀的人，这些人的家属又怎样过春节呢？我不敢再想了，我能活着就算万幸，不能胡想了。所谓“知足常乐”，不知足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正月十五早上，徐克成、李中候又回到我们这屋，徐克成对我说：“现在破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的案件，与李芳春有关系。”

我猛然想起，春节前郭股长找李芳春谈话，谈了几次，李芳春

回来便说：“真不好办。”现在我明白了，当时问他，他不坦白。接着就把他从我们这屋调走了，那天是腊月二十二。我问徐克成是怎么回事？

他说：“有一个叫于子杨的，解放前是李芳春运用的外围，解放后于子杨不但没有登记，反而继续活动，在火车上吸收了一些人。这其中有个叫刘金声的火车司机，被抓来了。我在于子杨那屋，李中候在刘金声那屋。他们都承认了这些事情，可是李芳春没承认。李芳春在楼上戴着手铐，还要撞头自杀呢。”

我点点头，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一切由个人负担。

3月，郭股长到我们这屋来，对我说：“你判断一下，军统特务再到大陆活动会怎样布置？你如负责将怎样指挥？看看你们写的与事实能不能相符合。”

我考虑了一个下午，根据解放后的形势及军统特务的规律，我判断：第一，退到台湾，军统与中统等机构要合并，把特务机关统一起来，便于指挥；第二，特务机关与美特会比过去加强合作，在东京、菲律宾及冲绳岛，设置训练蒋美特务的据点；第三，派遣特务潜入大陆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北朝鲜，由南朝鲜到北朝鲜比较容易；第四，进入大陆所用的掩护，是华侨、商人、学生以及于斌指挥的天主教神父和教徒；第五，派遣进入大陆的特务，以华东、华南籍贯为多。他们熟悉方言便于活动。大致是这些。写完之后，交给了看守所。这份材料写完的第二年，证明我的判断多数是正确的。

一年多了，接触了不少干部，除了郭股长之外，还有于、肖、杨、王、张等许多审讯员。他们对我都熟悉了，每次写材料，也不用交待政策，更用不着启发，到我窗户前说一句：“关梦龄把袁晓轩材料写一下。”我就可以写了。有时我问一句：“逮捕了没有？”他们便会告诉我逮捕或未逮捕。如果没有逮捕，我在写材料时，一定要写年龄、相貌、特征、身材、什么地方的口音；如果已经逮捕，就写他的罪恶及一些社会关系。这些材料写得很多，写的要领我已经知道。我写

出去的材料没有不合要求的。

我感到这些审讯干部对特务技术知道得太少。这也难怪，这些20几岁的干部解放前还念书呢，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军统特务”，解放以后才接触我们这些特务，所以只能要材料，别的谈不到。因此，我想把特务技术写一些，供给他们参考。

“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拟了一个提纲，也没报告郭股长，自己就写起来了。先写特务是什么时候有的？历史上，明朝的刘瑾就是特务，他有组织，叫什么厂卫；到了清朝雍正年间“血滴子”也是特务……

之后，写了一些特务技术等方面的材料，如情报、侦察、逮捕、审讯等，共写了四本，有300页。我写完由徐克成替我抄写下来。日特竹中看了我的这些材料说：“哈，哈，关先生知道这么多的特工知识，我们过去对军统局不知道，只知道蓝衣社厉害。”

我也问了他一些日本特工的情况。按他说，日本特工也有一套，比如在北京的一个日本特务头子，和北京人一样，化名“王二爷”。他就是日本特工技术较好的一个。日特在中国活动多数是收买利用中国人当腿子。日本钱多，只要肯花钱，在中国的特工就能搞好。所以说，日本特务技术在中国没有完全发生作用，发生作用的只是运用中国人。

我听了竹中的这些话想起1945年，“九·三”胜利后，军统局的特务在北京首先要逮捕日本特务头子“王二爷”，但是没有抓到。据说“王二爷”自小在北京长大，一口北京话，生活习惯也是北京化，所以很容易潜逃，这种特务技术就相当高。

1937年抗战开始，绥远的一个喇嘛庙走了一个喇嘛，这个喇嘛在这个庙已经七年，平素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以后才知道他是日本特务。这样的潜伏工作也作得好。再举一件丑事，傅作义部队用的包头以西的军事地图都是日本关东军测量局的，而不是我们参谋本部的。说明日本特务技术是很高的。

竹中在哈尔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干了多年，但对于特务外

勤知道得不多。

我把写成的这本特务技术材料交给了郭股长，我对郭股长说：“我这本材料，在被捕的这些东北军统特务里，是不一定有人能写得出来的。”

郭股长笑着说：“又自满了，你还能写很多东西，这屋子里有纸有笔，有时间你就写。”

我一定争取

6月底，美帝侵略朝鲜。东北各地的反动残余分子利用这个机会自发地进行反革命活动。长春公安局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天郭股长找我，对我说：“新逮捕了一些人，属现行反革命。你跟他们住在一起，要积极争取呀！”我说：“我一定争取。”

接触的第一个人像是孙×，汽车司机。他的姐姐在长春一个军医院当护士长。1949年与医院的一个老干部结婚。后来，这个医院的秘书被暗杀，这位老干部失踪。公安局便认为孙×的姐姐有嫌疑，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下二号。押了几天又把她的弟弟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上13号。我到这个监号什么也没拿，空身进屋，门开之后，看守在门口厉声地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他说，我也这样说。

门一锁，看守走了。石灰地上什么也没有，坐下太凉，我便把鞋垫在屁股下。吃完晚饭，他看看没有看守战士，便小声问我：“你怎么来的？”

“今早抓来的。”我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他是司机，我懂汽车。我先从汽车谈起，问他驾驶的是什么汽车？这样有了共同语言。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是饭馆的茶房。饭馆的常识我也知道一些，是可以叫他相信的。他问我为什

么被捕？我说因为一贯道的嫌疑。谈来谈去，他说伪满时给王庆璋开汽车。王庆璋是伪满的邮政总局局长，我的三舅。谈到王庆璋家中情况，我说得很对。他对我更有好感了。我对他说：“咱们是患难与共，不容易，有缘分。”我同情他，站在他的立场上替他想办法。他很相信我，什么话都对我说了。最后他说：“我姐姐嫁的那个干部是一个转业军人，年龄 40 多岁，他们结婚的经过我不知道，他们俩只到我家一次，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我们俩提审后先后回到监房，我回去时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对他说：“我的案子结束了，一两天就会释放我，我出去到你家去送个信，你有什么要紧的话可以告诉我。”

他说：“我家住在长通路天主堂后边，一个小角门里。你见着我家里的，告诉她：我因为姐夫逃跑押起来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事。姐姐也押在这里。我不会很久就能出去，不要着急。家中没有钱向老史家借几个，先维持一下，对亲友们就说我家到沈阳去了，不要说我被押起来。”

我说：“家中没有钱，不要紧，我在长春有朋友，我可以借给你几十万元（即人民币几十元）。等你出去，再还给我。你想想还有什么话？”

他接着说：“没有什么话了，你对我这样好，我出去再报答吧。”

看来这个人与这个案子无关。

6 月底，美帝侵略朝鲜，从报纸上看美帝在朝鲜很猖狂。我心想，美帝这样搞，日本、蒋介石一定趁火打劫侵占东北。情况紧张，前途不乐观，与我本身不利。他们打进长春，共产党不会把我释放，只能把我处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呀。又过了一天，下午一点多钟，郭股长把我找到前楼，我进那个屋的门口挂了一个牌子：执行科。他在屋内沙发上坐着，叫我坐到他对面，我说：“这个科是新成立的？您当科长了！”

他没有答复，笑了笑说：“今天没有事，随便谈谈。”他叫看守所的警卫员，去买了 20 个包子、一盒纸烟、一斤花生，不一会儿都买

来了。郭科长说：“吃吧，把这些东西都吃光，吃不光，明天再来吃。”我不客气地吃起来，他也吃了一点，一边吃一边谈，他说：“今天你谈谈反动派内幕派系，政治的、军事的、党的、特务的……”

我谈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我问：“科长，我这个案子政府已经决定了，我非常放心。说是没有死刑，没有无期徒刑，那当然是有期徒刑了。有期徒刑是 13 年呢？还是 10 年？”

“你不要问这个，反正对你是最大限度的宽大。这样的宽大，不但人民有意见，就是你们这些人，也认为判得轻。你好好争取吧！”

我们屋的竹中走了，把崔毓琛调来了。他是保密局长春站国际组组长，专做苏联工作的。长春解放后，他抱着电台自首，表现得不坏。解放前与我也认识，这次调到一个屋子，我心中很高兴，因为竹中走了，他可以教给我俄文。我对他一说，他慨然允诺。

一个礼拜天早上，又是 10 月 17 日，长春解放两周年。看守所把广播打开：“今天上午在胜利公园举行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共有七名……”

收音机关了，我一想开公审大会，又要枪毙人了！我回头一看，看守战士把裹腿都打上了。这少有的现象肯定与公审大会有关。我想了一会儿，枪毙谁呢？小红楼上没有人，只有前面圆楼的人了。我问徐克成：“圆楼的特务还有谁？”

“好几十呢，李寓春都在那儿呢。”

下午晚饭后，一个看守战士来换岗，他脸上还有灰尘，我问他：“你们今天到胜利公园去了吧？”

他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我心中明白，一定是从圆楼提人出去枪毙，能有李寓春吗？

10 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过了鸭绿江，情况很紧急。一天下午把我押到 3 号监号。不一会儿带进一个人来。他两手戴着铐子，拿着被子、毯子，身上还披一条毯子，上身穿一件便衣袍子，贴身穿一件英国式的西服衬衣，脚上穿一双礼服呢便鞋，胶底。东西放在地板上。我看了他一眼，他看了我一眼。他坐下来把毯子包在身上，

另一条毯子坐在屁股下面，被子盖着脚，显出很冷的样子。这家伙二十八九岁，高高的个子，灰黑的脸，两只狡猾的眼睛。我要搞清他是怎样一个人。我站起来装作小便，把头往墙上一靠，两眼一闭，往右一倒，装作头昏。他赶紧过来扶我。我长吁了一口气，勉强地坐了起来，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两手一抱脑袋。

他小声说：“不要着急。”

我一听是山东口音。他问我：“你是怎么回事？”

“我是特务，不是特务还不丢人呢。”

“呵，怎么丢人？”

“我在长春潜伏了两年，没暴露身份。在审讯中方知道最近从台湾来了特务，这样一来，公安人员认定长春有潜伏组，一查，我的一个组员被捕了，他把我供了出来。你看，这么一来，一连串，都完蛋了！”

听完了我的话，他低下了头，一会儿他问我：“台湾来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人不多，只有一两个人。”

又沉静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来几天了？”

“来两天了。”

“你何必来长春呢？你这套服装一到长春就得被捕！”

“为什么？”

“你看你这双胶底便鞋，胶鞋底上还有英文字呢，这样的鞋，大陆上是没有的。解放后，各商号一律取消英文招牌和商标，所以有英文字的鞋底不是从香港来，还有何处？再有，你这个毯子上也有英文字，还不是也告诉人家你是从香港来的吗？你的服装与长春的普通老百姓不同，使人感到突出，所以你容易引起怀疑。”

他没有吱声，他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保密局直属组，在长春潜伏的。我是组长，干了半辈子工作，就这回丢人了。”

“有台吗？”

“没有台怎么潜伏？没有台情报怎么报？什么都有。可这一次，

什么都没有了。”

“过堂了没有?”

“过堂了，什么还没说就给我戴上脚镣。戴上就戴上，说坦白从宽，我不相信。你从香港什么时候动的身?”

“9月初。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台北呢?”

“8月中旬。”

“台北局本部没有告诉你长春的生活习惯?及大陆上的风俗人情吗?”

“没注意这一点。”他摇了摇头。

“怪不得一到长春就被捕了，这不是送命来了吗?”

“咳!我不是派到长春的，我是派到北朝鲜的，我是路过长春的。”

“你受过训练没有?”

“受过训练，在台北。我们这一期有一二百人，都是军统的大特务当教官。我们受训的时候，不准叫姓名，只叫号码，绝对禁止谈论个人家庭历史。受了半年训，毕业。在毕业前实习半个月，发了不少钱，在台北狂嫖滥赌一阵，然后派到香港。到香港一个地方去见陈先生。陈先生又发给我的路费，派我到北朝鲜配合美军，进行收集情报及潜伏活动。我到了上海碰上了一个同学，我们在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回到山东原籍，在原籍住了几天，我把手枪藏在家中的荤油缸里。到了长春，长春我有个叔伯哥哥，我想在平壤定居，开饭馆。我想利用这个关系由东北转去北朝鲜，不意在长春暴露了身份，被捕。”

“在上海的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他到哪儿去了?”

“他叫×××，他是被派到杭州的。他在上海住西藏路174号后院一家货栈里。那个货栈是他亲戚开的。”

“你们的上级是谁呀?情报怎么传递?”

“我们的上级是陈先生。没有电台，主要是潜伏活动。到时候

派人来与我们联系，给我们送经费。我们潜伏好了之后，呈报我们的地址，他按地址找我们。横的没有关系，这是风筝式的潜伏布置，只有纵的关系。”

我从他身上得到上海一个特务的线索，及山东原籍藏在荤油缸里的手枪。这两件事，必须马上反映。第二天，在提他出审的时候，我汇报给郭科长，他说：“这小子到长春，不会是过路，一定有目的。上海的那个特务线索，昨天他只谈了一半，这回说全了；原籍的枪，昨天说是步枪，对你说手枪，可能是手枪，步枪缸里放不下；在长春的社会关系，山东同乡中谁还与他有来往？吸收人没有？再好好查问一下。这是争取的好机会啊！”我说：“我一定争取。”

继续查询收获不大，但讲台湾的特务训练很有参考价值。他说：“我在上海作战中挂了彩，上了轮船运到台湾。挂彩时是上尉连长，在台北把伤养好之后，保密局要伤愈军官受训，这样，我在1950年1月调到保密局受训。在受训时，还有美国教官教给射击术、擒拿、密码通讯等，中国教官多数我都不认识，乐于给讲政治。”

“乐干原来是长春警察局局长，与我认识，四川人，很能讲话。”

“对，对，能讲话，他一上课，谁也不困。他知道的事真多，美国人对他很好，重庆中美训练班就是他办的。”

其次，我利用机会打听香港、上海等地的生活。他谈了许多，嫖女人，吸鸦片，上海仍有卖淫贩毒。他领了几两黄金的路费，一路上花天酒地，认为此去生死未卜，得乐且乐，和我谈起在香港找舞女，到上海嫖妓女，眉飞色舞，仿佛身在当时境地……一举手，手上戴着铐子，他才意识到现在已经被捕了。

这个特务的名字叫梁金剑。

伊通小住

梁金剑的事情结束的当天，郭科长对我说：“回去把行李搬回你们小组，明天拂晓，要把你们 16 个人送到伊通县去暂住。这是为了防空，政府考虑你们的安全，才有这样的措施，你有没有顾虑？”

“我有顾虑，真的美蒋打到东北，我就危险，共产党不会把我放了，非把我杀了不可。我不希望到伊通，送到佳木斯或者满洲里那里还比较安全。伊通距长春才 90 里，没有什么安全可言。”

“这是你的错误想法，政府不会因为蒋美来了把你放掉，但也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把你杀了。到伊通是暂时的，比较在长春好一些。”

“科长去不去？处长去不去？”

“我送你们到那儿就回来。”

“局内的处长、科长都留在长春，我们这些人怕什么？”

“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不要有错误想法。在去伊通的路上和到那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反映，不要马马虎虎。你先回去，呆一会儿我集合你们 16 个人讲话。”临走，郭科长还给了我一盒纸烟。

约摸有半小时，郭科长在后小院召集我们 16 个人讲话。这 16 个有尚传道、李寓春、杨文昌、徐克成、崔毓琛、张致文、王鼎百、张伯桥、谷口（日特），另外还有几个蒙古王子和特务。郭科长叫大家不要有顾虑，并且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过了鸭绿江，美国鬼子来不了，不要恐美，我们有力量打败敌人！”

解散之后，大家收拾东西，有一些东西可以不带。我把东西整理了一下，又给北京胞弟写了一封信。我在 10 月中旬接到姐夫从北京来的信，他告诉我父亲在 1949 年夏天故去，我的老婆回了徐

州，在我岳父那里。家中一切东西皆由我弟弟掌管。弟弟对我置之不理，我老婆回徐州，他一个铜板也没给。我老婆只身抱着孩子走了。弟弟这样做太不应该，我要写信说说。

大概三点钟的样子我们出发了。马路旁的住户还在熟睡中，有一家挂着红窗帘，从里面射出光亮，似乎妈妈在给婴儿喂乳，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是不会有有的。我自己反动，结果把一个家庭搞得生离死别。父亲死了，我没有尽孝。老婆回徐州怎么过呢？自己今天押到这儿，明天押到那儿，到哪去都要夜间进行，见不得人。也难怪，我这种人叫人看见是颇不相当的。

早晨五点钟左右天亮了，看到伊通的房子，家家户户燃起了炊烟，有几个老头在马路边上拾粪，有的赶车往城里运柴草……我真羡慕他们的自由。坐牢知道自由的乐趣，患了病晓得健康的可贵。

进了伊通县城。我知道这地方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便大胆地东张西望。总也没看到社会上的事物，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街旁有许多卖小吃的摊子，我发现有卖切糕的，我幼年就喜欢吃切糕。有卖花生米的，有卖油炸果的，这些东西我都想吃。有机会买一点，我还有几十万元钱呢。

车拐了几个弯，在一家大门前停下，像一个粮栈的后门。大门打开，车开了进去。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下了车，把东西往里搬。搬到里面才看见有木栅栏。这是一个五间房的看守所。左两间，右两间，中间一间是走人的。屋内是对面土炕。出来进去必须弯腰。我看这地方太差了。没办法，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进去吧。我们住两间，分四个炕，用木栅栏隔成四个监号，我们 16 个人，五个人一个监号，尚传道单独一个监号。各监距离很近，彼此能看见，随便说话。我与徐克成、张伯桥、谷口、崔毓琛五人住里边一个监号。

这是伊通公安局看守所。五间监房，我们占了一半，那一半伊通公安局用。这儿的犯人说话我们能够听见。这儿看守所的制度与在长春不一样，这里的犯人一动就要报告，“报告，我咳嗽！”“报

告,我小便!”“报告,我换一换腿!”“报告,我擦鼻涕!”“报告,我找虱子!”“报告,我扣裤钩!”……一天的“报告”,彼落此起。看样子都是乡下人,或者是地主恶霸之流,长得土头土脑。王所长对我们说:“你们彼此之间不要叫名字,叫号,叫人知道你们是谁不好。”

我叫尚传道为希贤,他叫我梦龄。

与我们同来一个班战士,看守所只有王所长一人,我们一切活动与伊通公安局的犯人隔开,只有吃饭在一个锅里煮。高粱米饭,白菜汤。千篇一律。

有一天,我对王所长说:“这菜里的盐太少,咱们自己买点盐,再买一点辣椒末。”

我们自己刷碗,扫地,晚饭后烧炕,各组轮班摊勤务。白天看书,晚上下象棋。坐在土炕上开“口头宴会”:这个饭馆子有什么名菜?那个地方出产什么好吃的?糖醋鱼怎么样做?锅贴鸡怎么做?你一句我一句,很有意思,津津乐道,臭味相同——对于旧的东西都那样留恋,对于吃喝玩乐的生活都不愿放弃。没有人反对开“口头宴会”。

到这之后没有材料可写,也没有人找我。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崔毓琛学俄文。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毛主席的《实践论》,由杨文昌负责领导。杨文昌是大学副教授,后来参加了军统,他是北平组的组员。解放后自首于北京,后来到了长春,在东北大学任副教授。他到长春报告过公安机关,因此他被捕后,公安局对他予以优待。他的理论知识很丰富,马列主义也有所体会,他领导我们学习,大家很有心得。

到这里没几天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张伯桥是中统局长春区的总务科科长,北平大学毕业,英文很好,国文也不错。他参加中统日期并不多,后来兼长春特秘处^①的调查组组长,由他收集情报杀害了一些地工人员。被捕后他始终认为自己必然被处死。每天老是摇头叹息,1949年在公安局把他案子结束了,1950年春把他解到长春监狱。大概考虑他是个危险人物,于是又把他解回公安局看

守所。

早在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反动派要抓一个共产党地工人员，这个地工人员是张伯桥的朋友，他把他掩护起来，救了他，解放以后，这位地工人员在察哈尔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充主任委员，知道张伯桥在长春被捕，便给长春公安局来了一封信，证明“一二·九”运动张伯桥有功，并给张伯桥汇来一百万元钱。这样一来，公安局给他宣判有期徒刑十年。可是他心眼小，到了伊通，天天两眼望着屋顶乱想。我也想不到他会肇生意外。人人都不能设想的事情，在一个晚饭后发生了。

有人对王所长说：“我们手指甲、脚趾甲都长了，请借把剪子，剪一下。”

这个要求不成问题，王所长向马夫借了一把剪马鬃的剪刀。这个剪子比较大，王所长叫大家传着使用。轮到我们小组，先由徐克成用，然后张伯桥接了过去，他拿着剪子往脑盖上乱戳！不一会儿血流了下来……当时我在看报，他戳了几下我才发现，我上去把他剪子抢了下来，我气得打了他两个耳光，骂了他两句。这时大家都过来了，一看，他要自杀，赶紧报告王所长。王所长把他叫出去并没有责怪他，就领他去了医院。从医院回来，张伯桥头上扎了雪白的大绷带。我们大家把他恨死了。特别是我，郭科长分派我当组长，嘱咐我“绝对不要出事”，将来郭科长问我，如何回答？

王所长批评张伯桥：“你这样胡搞与你有什么好处？你这样做，自己受痛苦，对大家也不好。”

“请示所长给我戴铐子，给我严厉处分。”张伯桥站起来说。

“戴铐子就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真的戴上铐子，不知你又怎么想了。什么也不用戴，你冷静的想一想，想通了再谈。”

王所长把我找到他的小屋子，开始就问：“前天晚上，张伯桥出事时，你打他耳光了吗？”

“我没打。”我笑了。

“你当个小组长，就有打人的权利吗？你再打人，可要犯错误。

这件事不发生别的组，偏偏发生你这小组。你还笑呢？”

“这样的人我没办法，以后再别借剪子了。”

“这是剪子问题吗？是思想问题。你怎么学习的？”

我很佩服王所长，他只有20几岁，山东小伙子，一个文化不高的干部。这二年他进步很快，对待张伯桥这件事，我认为一定会砸上镣或戴上铐，可是他没有这样办，而是和风细雨地教育了几句。使大家对王所长深加敬服。我内心说，这样的处理比戴上铐更起作用。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干部倒是不简单，我自愧不如。这一件事使我们16个人，进一步感到政府对我们的温暖与宽大。

收复平壤的消息传来，大家很高兴。我在监号对大家说：“咱们庆祝平壤解放，改善生活，自己拿钱买肉，大家赞成不？”

异口同声的赞成。于是我向王所长请示，并得到了王所长的同意。我们16个人，买了12斤肉。我和尚传道出的钱比较多。利用这个机会吃了一顿肉。由于肉少人多，感到还没解馋。

过了几天，于审讯员把高洁和胡泽雨接走了。又过了几天，宋所长把李寓春等八个人也接回了长春。最后只剩下尚传道、李中候、徐克成、崔毓琛、杨文昌和我六个人。

快过新年了，战士们要开新年晚会，叫我给编节目。我给他们编了一段快板，几个小调。每天晚上我到他们的屋子去教他们，他们那屋墙上挂着武器，从不防备我。有时他们买吃的也给我吃。王所长也在屋。大家说笑，也不回避。我感到政府对我很相信，思想上非常轻松。我对尚传道说：“过新年，咱们再买几斤肉炖一炖。这回由我做，保险比上回炖得好。”

大家都同意，由尚传道、杨文昌和我出钱买了五斤肉，还打了半斤酒，二斤花生米。打酒是我向王所长请示的：“我不喝酒，他们要喝一点，就给他们买半斤吧？我保证不会出事，张伯桥那样人是少有的。过年了，半斤酒不多。”这样，我们便买了半斤酒。

12月31日下午，我到大厨房炖肉，杨文昌烧火。炒了两个菜，一锅大炖肉，吃的大米饭。这个新年我们过得很好。事后我才知道

王所长没有过好，一个战士对我说：“你们吃得好，你可不知道老王生了多少气！你到厨房去切肉，手里拿着菜刀。这里的看守所所长给老王提了意见，人家说犯人怎么能到厨房拿刀？老王说这些犯人都是比较进步的。人家又说，无论怎么进步也是犯人。这么一说老王就生气了。”不是咱们那儿的看守所，只好听着。我们大伙也感到不痛快。这个年过的……”

我感到很难过，觉得对不起王所长。一个犯人要求吃肉喝酒，太过分了。我回到屋一说，大家都感到怪我们自己。大家决定，今后除了买书，其他东西一律不买。

顽 固 者

新年过后我们都回到了长春公安局。

一天，郭科长与大家谈了一会儿，又单独把我留下。他问我：“尚传道^⑤写了三百页的材料，是谁叫写的？”

“是我启发他写的。我的意思是，他到了公安局就吃小灶，什么罪恶也没有交待，应该主动写一些材料，争取进步。”

“难道我们没有图书目录吗？他写了一些图书目录；他读过这本书，读过那本书，这样体会，那样体会——卖弄自己的学问呢！一点罪他也没谈。这样的人给他机会反省，他也不认识自己。与你们差得很远。以后再不要启发他了，等他自己慢慢的认识吧。”

在伊通时，我对尚传道说：“政府人员对你一向很客气，从不谈话，也不找你，可是你也不找政府，这样下去不好。应写材料，请求谈话，交待问题，坦白罪恶，不这样主动争取是不行的。每天只看一些书，写些日记，那是消极的，应当积极。”

于是尚传道听了我的话，写了一篇三百页的材料，名为“四十回忆”。主要是解放后，他读了一些经典著作的体会，摘引了许多毛

主席的话，及马列主义的书名。写完给我看了一下，我感到他的认识太差，自以为是，但是，写出来了，我说可以，他就呈给了政府。结果受到了郭科长的批评。尚传道一直不知道这件事，还以为自己这件材料写得很好呢，其实不很好，或者很不好。

接着郭科长又布置我到圆楼楼上的 4 号监房去做工作。

有一天段克文^⑥来了，他穿着一个黑布破棉袍，戴一个古铜色的旧毡帽，脚上戴一副镣子。我曾在长春见过他一面，那是 1948 年夏天，在长春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家中。我与他点了点头，没有谈什么话就走了。虽有一面的会见，我没有忘记他，他可能忘记我了，所以，他见我一点表情也没有，不认识倒好。

段克文当过吉林伊通县县长，军统的外围，一贯是飞言浮躁，到任何地方都好出风头，夸夸其谈，有骆驼不说牛。一个没有修养的荒唐鬼。

他进号之后，问这个问那个。我告诉了自己的姓名，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小特务。他问：“在哪部分？”

我说在督察处，他的下句话一定是：“你们处长张国卿我认识。”果然，他是这样说的。我笑了笑，他又说：“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也认识。”

在他心目中这些高级特务都是他的朋友，他的长官。衬托他在反动派里也很有地位。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也不知道督察处处长与督察长是什么关系。坐下之后，东张西望，他可能考虑为什么把我从十号监房迁到四号监房呢？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潜伏后被捕获的，看他那套衣服，故意装穷，怎么瞒得过公安人员的眼睛？

重新编组，我是 4 号的组长。给我这组调来几个人，都是现行活动的嫌疑。如苗佩然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职员，在口型科工作。其他如林宝华、杨绍时等也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嫌疑。

开头一次会，我说：“咱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姓名、职业，好称呼，以便学习。”

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了，段克文没有说他是军统，他只说：“我是

吉林伊通县县长，在1947年只干了一个月，以后就退到长春，赋闲。”

这么简单？不老实。我没有吱声。

苗佩然说：“我在长影口型科，是翻译外国片子，对口型的。我每天早晨起来练习举砖，有几个人与我一起练。我说咱们成立一个‘砖头会’吧，我当政委。就这样被捕了，其实我们是开玩笑的。”

晚上开会，段克文胡吹瞎扯，什么罪也没有，并且还说：“我认识张学思，有人叫我杀张学思，我没有干。我们是小学同学，我怎么能杀他呢？”

别人对段克文的事知道得不清楚，我说：“政府掌握全部材料，对于你段克文也不例外。你说这一套连我都欺骗不了，你还想欺骗政府！”

我这样说他感到很惊讶，冷笑了一笑。

段克文出去写了两天材料，回来直摇头，似乎有什么难心事。这小子一肚子诡计，两眼一翻，就生个坏道。我不理他。

一天上午，于审讯员找我：“段克文在你那个小组吗？”

“是的，表现不好，问题多。”

“问题不少。他是不是军统？”

“是军统，不是基干。他怎么交待的？”

“他说，1946年在沈阳，由辽宁省主席徐箴介绍任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纠察队队长，以后就到吉林省当参议，又当伊通县县长，一直到长春解放。”

“他这是胡说，欺骗政府，1946年他到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充纠察队队长，是军统东北特务头子文强介绍去的，躲避特务关系。在抗日时期的活动，他交待得也不清。他在小组会上说，他当游击副司令什么也没有干，这也是令人不能相信的。我看这家伙不是交待问题，是来钻政府的空子。”我告诉于审讯员，先追他在东北的社会关系，到东北先找的谁？这样一追就使他破绽百出，现原形。

第二天早饭后，提走了段克文，中午回来，他戴上了手铐，脚

服，夏士栋给段克文一个大耳光。段克文两手戴着铐子，无法还手。我回来之后听说此事，批评了夏士栋，叫夏士栋写检讨书。夏士栋对段克文说：“我情愿加罪，非打你不可！你胡闹，我就要管你，县长、省长也不行！”

我对夏士栋说：“不行，打人不对，这是看守所！”

同屋的犯人对段克文都十分愤恨，他不守制度，还说：“你们用我作进步的台阶，那错了！我知道你们是假进步，实际你们心里还同情我呢。这一点我还看不出来？”

我对大家说：“叫他自己反省吧，不要对他进行帮助了。”

对于苗佩然的案子，我也多次进行了解。解放以前，他在国民党军队政治部工作过，充少校政治指导员，参加过国民党及三青团，解放后，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又分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他因成立“砖头会”被捕，惟恐他是打进来的内奸。我很注意他的社会关系，他过去的上级现在有的在起义部队，有的在北京学习，他的亲友都在北京，长春没有社会关系。他这个案子归于审讯员审理。于审讯员找我研究了一次，我从苗佩然老婆的来信、他的日记里找不到现行反革命的依据。我说：“他历史虽有问题，但是现行活动没有。”我又建议，“长春的问题大致是这样，不会再有新东西，现在应该到北京了解他的一切情况。如果是现行活动，指挥他的人在北京，传递情报是他老婆的来信与他的去信。如果是这样，还要化验他们的信笺，是用什么方法书写的？是密码？还是什么化学手段？”

于审讯员点头，认为我说的有道理。

我白天几乎不在小组，我到小红楼与杨文昌整理各小组的材料。有一天，杨文昌说：“科长叫我们赶快把这部分材料结束，又要展开新的学习了。”

第二天早饭前，收音机一打开就听到了长春市广播电台的广播，播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一条……处死！第二条也是处死！播到第四条，电门关了。犯人别的没听到，只听到“处死”。

①长春第一次解放：1946年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解放长春，后根据中央“变阵地战为运动战”的指示精神，决定放弃长春、吉林，撤至松花江以北。1948年10月19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

②军委会特务处：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军方”黄埔系的骨干分子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下设有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1934年4月，复兴社特务处又与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仍由戴笠任处长。1937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党务调查处为第一处，特务处为第二处。1938年8月，蒋介石把第二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常简称的“军统”，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1940年戴笠任局长。

③10月17日长春解放：长春宣告解放之日是1948年10月19日。10月17日国民党六十军起义，撤出防地，即人民解放军部分的解放长春。关梦龄如是记载这个日子，与他后来的遭遇紧密相联，故整理者保留了这个误点。

④长春特秘处：全称为“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秘书处”。1948年在解放军兵临城下，长春市人民掀起反抗斗争，时局危机的情势下，为加紧对人民的镇压，于4月经吉林省主席、东北剿总副司令、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批准，成立了该组织。“特秘处”囊括了长春市的军、警、宪、特、政的全部力量，由保密局长春站、长春警察局、长春市政府、长春宪兵营、第一兵团司令部军法处和政工处、省党部、中统长春区、国防部史祚炎高参办事处、长春督察处等组成，郑洞国任主任委员，王中兴任主任秘书承办具体事宜。

“特秘处”建立几个月便审批逮捕二百多人，签报上级审核杀害四十余人。

在“特秘处”这个特务的联合体中，督察处起到了核心作用，它是“特秘处”罪恶活动的主要承办者。

⑤尚传道：原国民党吉林省民政厅厅长兼长春市市长。1975年3月获特赦。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港澳台暨海外组组员。已故。

⑥段克文：据1975年第七批特赦国民党人员名单记：“段克文，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特赦后经香港去美国。已故。